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18 期 2012 年 9 月 20 日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他让我认识到父亲思想遗产的价值 · 孙丹年	2
长寿湖逃亡者谭显殷自述 · 谭松	8
在父亲谭显殷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讲话 · 谭松	16
我在“三反、五反”中当新闻官 · 文履平	17
文履平生前书信一封	19
“解密”和“还原”掩盖了什么？ · 申如 若水	20
罪恶的档案 · 赵文滔	29
故乡三题 · 陈仁德	34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 柴静	41
还原作家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土改真实故事 · 崔卫平	45
《巴山夜雨》电子邮箱: bsyy1957@Yahoo. cn	

他让我认识到父亲思想遗产的价值

——胡晓风与孙铭勋的遗著整理与传记写作

孙丹年

（一）

胡晓风与我的父亲孙铭勋，同为陶行知门下弟子，同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都为继承、实践、光大陶行知教育思想，为建立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长期出生入死，英勇奋斗。

1980年代初，胡晓风在整理研究陶行知精神遗产时，从众多陶门弟子留下的文字中，发现已经去世20年的孙铭勋的理论建树，加以重点关注。

我的父亲孙铭勋，1928年入南京晓庄师范，是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终身追随并实践陶先生的理想。1950年被重庆市政府任命为重庆育才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1961年1月20日病逝于重庆北碚西南师院。

孙铭勋去世23年后，1984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的母亲邝忠龄整理编辑的《孙铭勋教育文选》，这是“文革”结束后陶门弟子中出版的第一本专著。

孙铭勋去世46年后，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编写的传记《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该传记的资料收集整理编撰过程，长达27年。

胡晓风与这两本书都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贯穿于编辑出版的全过程，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了胡晓风——以及当时尚健在的许多陶行知亲炙弟子——的关注和指导，这两本书能够较为端正、较为纯粹地体现生活教育的本质、内涵与精神实质。

（二）

第一本书——《孙铭勋教育文选》，邝忠龄编，1984年，重庆出版社。

1978年，文革刚刚结束，我的母亲邝忠龄开始谋求为我父亲孙铭勋平反。她找过重庆教师进修学院的刘博禹（职务大概是教务主任），重庆市教育局局长田伯萍，到成都找过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胡晓风等，当时胡晓风还负责四川省文化部门落实平反政策的一部分工作。

在1978年，受难者家属为平反奔波，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如果没有胡晓风、田伯萍、胡一禾、刘博宇、楚图南、贾培基以及一大批陶门同仁的鼎力帮助，为孙铭勋平反是很难落实的。

当年，我母亲趁暑假到了北京，请育才校友胡一禾代为联系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董纯才。董纯才住在北京三里河，胡一禾陪同我母亲前往，但胡一禾没有进去，在外面等候。我母亲进了董纯才家，见面后谈了给孙铭勋冤案平反的事，董表示不理解，反问：“为什么这种事要由家属出面、来四处找人平反呢？平反应该是中央自上而下的。”见话不投机，我母亲便告辞了。

胡一禾又代为联系了楚图南，带我母亲去楚家，仍然是他等在外面。楚图南住在一个大四合院里，一个秘书模样的人领我母亲进去。我母亲对楚图南说明来意，楚马上叫人拿来纸笔，纸是竖条纹的信笺纸，他用毛笔写了一封信，写给担任四川省委顾问的任白戈，大意是：孙铭勋当时因为自杀而开除

党籍，是处理得太重了。

我母亲在北京还找了孙铭勋的贵州同乡、当时是民建中央领导人的孙起孟。孙起孟很关心孙铭勋，问了许多情况，让焦虑万状、身心疲惫的我母亲感到温暖。

我母亲回到四川，到成都的文庙前街找已经退居二线、担任四川省委顾问的任白戈。不巧任白戈去峨眉山避暑了，不在家。我母亲便把信留在他家。

然后我母亲又找胡晓风。胡晓风告诉她说：中央有政策，大意是要在春节前平反落实一批，必须抓紧，建议她回重庆后马上找“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

暑假结束了，我母亲是小学教师，开学得上课，打探这件事的下文只有见缝插针进行。那时办事靠跑路，先打听好要找的人的住址，往往星期天在凌晨去堵住要找的人。在重庆，许多相关的办公室她都去闯过，管他里面坐着的人高兴不高兴。我母亲说：没有这点闯劲，也落实不了政策。

我母亲找到田伯萍探问这事，田伯萍说任白戈已经拿出意见了：“当时对自杀的人处分都很重的，现在看来是重了点。”

我母亲一听这话，立即到西南师院“落实政策办公室”，找到一个姓汪和一个姓杨的，催他们快办。她强调说：“中央有指示，春节前必须落实。”他们一听她知道内部消息，态度就客气了很多，强调他们人手少，光是看档案都看不过来，但是答应给办。

我母亲要求开追悼会，他们说现在不兴开追悼会了，并且说孙铭勋不够开追悼会的级别。气得我母亲反问道：“当时在报上点名批判就够级别了？”（1951年至1952年在各大报刊上点名批判孙铭勋，连篇累牍达7个月之久）他们无言以对。

这么毫不放松地催促，孙铭勋的名字总算在第一批见了报。以“改正错划右派”的名义，1979年1月26日《重庆日报》登载：“……西南师范学院原划为右派分子的十五名正副教授，已有刘又辛、熊正纶、叶廪、孙铭勋等十人得到了改正。”点到名的另三人都健在，只有孙铭勋是已经去世了的。

右派问题“改正”以后，为了恢复孙铭勋的党籍，1979年9月，我母亲又给任白戈写了一封信，不久收到任白戈的回信。任白戈的回信用的是印有“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字样的稿纸和信封，信中说：

……你所说的要恢复他的党籍问题，这需要查出是哪一级党委作出的决定，从那一决定的档案中看是根据什么开除党籍的，然后进行复查解决。过去自杀是作为叛党处理的，自然要开除党籍，但他自杀未死，可以不开除党籍，如仅因这条错误就开除党籍，我以为是应当恢复；如尚有别的错误，但未达到须受开除党籍的处分，亦不应该开除党籍。根据中央新近关于自杀问题的处理原则，你可以就近请西师党委会复查。既然申诉书已经写了，你可催促一下党委，要求从速解决这一问题。

专此简复，即致敬礼！

任白戈 1979，9，17。

我母亲拿着这封信，就像奉了圣旨，立即行动，催促落实。她为孙铭勋写了“平反结论”，得到组织认可。她继续找落实政策有关部门，再三要求将《复查结论》公开登报。

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我母亲觉得，孙铭勋仍然不能瞑目——这只是他生命的一半，至多只能闭上一只眼，另一只眼依然大睁着不屈不挠——他一定要看到陶行知教育思想重新发扬光大，一定要看到中国教育走上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我母亲提出孙铭勋学术贡献的问题，她觉得《复查结论》中对孙铭勋一生的业绩肯定得不够，她要求承认孙铭勋的学术成果。1981年6月1日在对“孙铭勋党籍问题的复查结论”第二次征求意见时，她提出两条意见：

（一）孙铭勋在教育理论上的著述，在国内是有一定影响的。各大图书馆都保存有他的一些著作，各师范学院教育系和学前教育专业在授课中仍引用他的话。在结论中，这方面只字未提，我以为是个缺憾。这是个重要方面，哪怕只有片言只语，总应该有。

（二）开除孙铭勋党籍时，不止见一次报。整版批判，头版头条，影响是很大的。现在在文化教育界、新闻界接触到孙铭勋这个名字，许多人不知该如何处理。我是为了有利于党的威信，有利于革命事业，要求在报上发条消息。

我母亲的这两条意见没有被采纳，孙铭勋的学术成果得不到承认，平反消息也没有见报。

我母亲为了坚持这两条意见，不屈不挠，四处求告。她拦住西师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质问，要求承认孙铭勋的学术成果，逼急了，对方回答：“不懂，不能负责任。”

是胡晓风为我母亲解开了这个心结。胡晓风说：“学术问题你自己来解决，应该为孙铭勋出版一本学术著作。同时应该搜集资料，为孙铭勋立传。”

为了给孙铭勋写传，我母亲找到田伯萍，请他回忆当年的情况，还请他提供知情者的姓名住址。同时开始了天南地北的搜集资料的工作，先后到过南京、淮安、武汉、成都，更不用说重庆市内了。

在胡晓风、田伯萍等老干部支持下，我母亲编辑出版了《孙铭勋教育文选》，这是改革开放后，陶门弟子中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孙铭勋教育文选》的出版过程费了很多周折。送出版社时，许多人不知道孙铭勋是谁，偶尔知道的，印象中也仅仅是“问题严重”；人们更不敢为“孙铭勋的作品现在还有没有问题”负责。胡晓风和金成林曾经商量在四川教育出版社出这本书，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最后，田伯萍在重庆顶着巨大的压力拍板，作了决定，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

胡晓风亲自为这本书作序，序言在报上发表。

在既无复印机更无电脑的1980年代，我母亲不光是踏踏实实地多次进行陶研综合改革实验，举办实验班，也一直为陶研编辑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用她端正清晰的小楷字，将胡晓风寄来的一批批手稿誉正、校对，然后寄回。

（三）

第二本书——《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孙丹年著，2007年，贵州教育出版社。

我的母亲邝忠龄写了《孙铭勋小传》，7000余字，这是她努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母亲于2005年去世，她未完成的心愿——为孙铭勋立传，由我这个女儿继续努力。

2002年，我调动工作，到了一个比较清闲的单位，争取到了自由空间。大约在2003年前后，我

天天去重庆图书馆查阅、复印旧报纸，然后将 20 余年来所有收集的孙铭勋资料加以整理编撰，打算写成一本连贯的、可读的东西。但是能够做成什么质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需要相吻合、能否被出版社接受，我心中没底，只是凭着惯性和韧性，先做着，边走边看。

2004 年，这本存在于想象中的书，遇到了第一位“贵人”——贵州教育出版社的梁茂林。梁茂林从贵阳的地摊上买到了 1984 年出版的《孙铭勋教育文选》，他想找到孙铭勋的子女，为孙铭勋立传。于是，盲人瞎马的我，碰上了正在到处找孙铭勋后人的梁茂林。梁茂林郑重地数次将我请到他位于贵阳的家中，以一位教育出版专业资深编辑的深谋远虑，对我进行写作指导。梁茂林惟恐我受长期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将孙铭勋写成一个“为了武装夺取政权而奋不顾身的斗士”形象，他要在谋事之初为我拨正船头，以教育本义立论。幸好，我本来并未立足于此，于是两人高度契合。

初稿完成，我将书稿寄发出去，广泛征求意见。大感意外的是，遇到了一个情绪颇为激烈的读者，他便是这本书的第二位“贵人”——胡晓风。

胡晓风的第一次意见，是以在电话中大发脾气的方式表达的。此后还有多次发脾气，但就数第一次最猛烈，给了我一通狗血喷头。这次通话时间在 20 分钟以上，具体针对的，是有关书稿中陶行知与孙中山思想影响的传承关系。我原本表达的，基本上是来自于教科书和一般普及读物的印象。胡晓风则认为这有违陶行知乃至孙中山的原意。

在所有的反馈意见中，就数胡晓风最认真、最纠结，他不能容忍我降低陶行知的精神高度、误解孙中山的论述、违背历史真实。

这次挨骂留给我的印象是：胡晓风为了陶先生的精神遗产，似乎每天都要怒气冲冲地跟人讨论或争论，伤肝动脾。事实上，这正是胡晓风编辑十二卷本《陶行知全集》时，处于长期、艰苦的奋斗过程中。他的痛苦焦虑、趑趄辗转，不是人人都能体会的，真正是知音难觅。

这使我很来精神，我知道自己在写作上遇到了知音。我无知，胡晓风愤恨于不少人的既无知又不学。碰撞由此开始。这里引用我们之间多次通电话的其中一次的部分原始记录：

（2006 年 8 月 6 日夜，胡晓风来电话，关于他与金成林的专著《陶行知与现代化》第 13 章之内容）

孙铭勋与陶行知在“定于一”（孟子语，此处的“一”指民主主义）的基点上结合，在民主革命道路上继续发展，最后在专制体制的压迫下消亡。

定于一，实行民主者则能“一”之。陶行知两次引用“定于一”。

第一次，是 1929 年陶引用孟子的“定于一”，是针对蒋桂战争和蒋冯战争而言，也是针对国民党内各派系有关真假三民主义的争论。

陶是真正的民主主义的信徒，相信“只有真的三民主义才可以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的真正信徒，才能发生力量去救中国”。晓庄学校开办半年就树立“三民主义教学做”的标语牌，还印好《三民主义千字课》课本，于 1927 年 12 月送至开封冯玉祥部队中。

另一条标语“教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做皇帝”也是吸取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的精神而来。

陶行知 1929 年所主张的真三民主义，最后以乡村教育为归宿。陶的“定于一”是从生活中来，以教育为中介，回到生活中去。整个过程又以“做”为中心，以乡村教育教学做，作彻底的革命。

第二次引用“定于一”是在 11 年后，1940 年 12 月 20 日，陶行知访晤斯特朗，两日后，陶行知在备忘 35—028（1940，12，22）中说：“定于一，实现民主者能一之”，意即真三民主义也由实行民主者取而代之，是形势发展的必然。

1944 年 9 月 20 日《创造的儿童教育》：“注意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在民主生活中学民主。专制生活中可以培养奴才和奴隶”，但决不会培养人民做主人或成为人才。

陶行知准备创立农业组和工艺美术组，以此为创立育才大学之初基。“当育才成为羽毛丰满的、献身于真理、博爱和服务的大学时，这两个组将是农学院和工学院的基础”。见《陶行知全集》第 6 卷第 410、515 页。意义为，提出了“创造性救济”的概念。

陶之民主：创造性救济即服务，智丰（此二字不知是否记录正确，笔者注）尖端即真理，基督伟大之爱即博爱，这是最高形式的民主。

1944 年 6 月 21 日，陶首先喊出“民主第一，民主至上！”

陶论独裁作风：见陶全集第 4 卷第 513、514 页

陶行知一生跨越了 6 次民主启蒙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成功、新启蒙运动、民主运动。后五次启蒙运动他都站在运动前列，但生前死后都处于社会边缘地位。惟独逝世前最后一年，却成为举世闻名的风云人物，众人称之为“民主之魂”。

唯物、唯心不能分成两个阵营，那是阶级斗争的反应。

以上引用的仅仅是多次电话中的一次。一般来说，只要拨通或接到胡晓风的电话，就得有至少通话 10 分钟以上的思想准备。10 分钟是最低限度，最长超过一小时。我想，也许，胡晓风是以通电话的方式来缓解他长期负重的精神压力？

和胡晓风通话，不会轻松愉快，没有家长里短，极少陶行知理论以外的内容。

由于我长期从事革命题材宣传展览的大纲编辑，初次的书稿目录采用大型展览提纲的三级标题方式，高度集中和宏观，十分高调。这使得胡晓风“很不爽”。他直接批评说：“你不要用那些词汇，不要那么极端和高调。那不符合事实。”根据他的意见，我将标题全部调整修改了。

2005 年 3 月，《炎黄春秋》杂志以《“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为题，登载了书稿第四章中的主要内容，这使所有关注此书进展的人全都欢欣鼓舞。

2007 年 12 月，《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面世，全书 40 余万字，收入 89 幅图片和复印资料，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受贵州出版企业发展、贵州省平坝县人民政府专项资金资助。赶在 2007 年内出版，是希望作为献给“晓庄师范暨生活教育运动 80 周年纪念”的一份礼物，但是这行字最后没能写上去。

此后，我与胡晓风的交流沟通更为平常和随意。

有一次，我向胡晓风谈到，1950 年代初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柳湜于 1952 年初在《人民教育》上发表《略论对孙铭勋错误思想的批判》一文，从而将批判孙铭勋的影响扩大到全国范围，使孙铭勋

全家陷入更深的苦难中。柳湜是推行生活教育的陶门同仁，与孙铭勋同为中共党内同志，还曾经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何至于如此落井下石？

胡晓风语气沉重地回答说：柳湜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杂志总编，因为他曾经在延安大力推广陶行知，在 1951 年的大气候下，各方面矛头都对准他，他不得已被迫批判陶行知和孙铭勋。文革中，柳湜被迫害致死，好像连尸首都未找到。

还有一次，我提到，现在有一些朋友正在对当年的历史进行澄清，胡晓风表情凝重地说：“我对你们只有一个希望，就是，不要造成新一轮的对人的伤害。”

从与胡晓风的交流沟通中，我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陶行知研究。

（四）

孙铭勋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人，他从小离经叛道，言行出格。

1950 年代初期，军事胜利压倒一切，许多社会机构都实行军事化管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孙铭勋不迷信和盲目服从上级，市里安排的位置他不去，非要在重庆育才学校里继承和贯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仅这一点就让很多人接受不了。他脾气急躁、行为大胆、语言冲撞，得罪人无数。数十年后，许多人提及孙铭勋依然摇头。

是胡晓风，从世俗的口水中，发现并提炼了孙铭勋的精神价值、理论价值与历史价值。胡晓风撩开日常生活的纱幕，撇清闲言碎语的干扰，注意到孙铭勋的精神追求。

胡晓风不仅表扬孙铭勋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坚持重庆育才学校、使之凝聚不散的功劳，不仅肯定孙铭勋对陶行知教育教学实践的突出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孙铭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论上的创造性贡献，并力主将这些理论建树公诸于世。

胡晓风曾经对我说：“我查阅所有陶行知弟子们的著述，找来找去，发现孙铭勋还有点东西。”他所说的“东西”，是指思想贡献、理论成果。他说：“很多人都对实践和弘扬陶行知思想有贡献，但是他们都不如孙铭勋那么坚决和彻底，那么充满创造精神。”

这就解释了 1951 年为什么会选择孙铭勋作为批判陶行知的活靶子，这也使得长期挣扎于认识泥潭中的我感到非常欣慰。

孙铭勋是在民主主义这一根本立场上与陶行知先生结合起来的，也只有在这一核心认识上与陶先生达成了默契，孙铭勋的步子才会迈得那样地坚实执着，誓无反悔。

我也是在民主主义这一根本认识上接受胡晓风的批评教育并达成高度一致的。以至有一次金成林慎重嘱咐我：“你到了胡晓风家，不要提民主二字，他比你还要民主！”金成林的意思是，避免胡晓风因激动而引起旧病复发。

2012 年 4 月 27 日 13 点，胡晓风先生在成都病逝。我送了一幅挽联：

立论独到纵横捭阖一代陶研开基业

泣血呕心碧落黄泉万载育才觅真知

谨以此文悼念胡晓风先生，愿九泉之下的净土，能安息一颗激烈搏动了 88 载的红心。在陶行知研究的历史长河中，胡晓风先生永垂不朽！

长寿湖逃亡者谭显殷自述

谭松

按：谭显殷（1928—2012），四川省万县（今重庆万州区）人。1947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即参加中共外围组织，领导学生民主运动，曾任地下社支部书记。中共执政后任重庆市南岸区团委书记、中共南岸区委宣传科长。1957年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任上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中共党籍，撤职、降级、降薪，下放长寿湖渔场劳动改造。“改正”后曾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高教办公室主任、重庆市人大常委、市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本篇摘自其子谭松在他支持下采访、撰写的《长寿湖》一书。

解放前，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摆在面前有三条路：一、科学救国；二、追随国民党；三、跟共产党走。我选择了最后一条路，这在当时是最艰辛最危险的一条路。为什么？很简单，为了民主和自由。我认为国民党专制腐败，中国的希望寄于大力呼喊民主和自由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我出生于四川万县高粱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那年，父亲贫病交加上吊自杀。父亲虽然穷，但有点文化，他让我上了小学。12岁那年，有一个也姓谭的地主打算送他12岁的儿子到重庆读书，他不放心，想找个陪伴。

我当时在那个乡坝头有点小“名气”——鬼机灵。我点子多，上树掏鸟蛋，下河捉鱼，我总比其他娃儿能干，连同姐姐抬水（她走前，我走后），我都悄悄把桶绳往她那边移一节而让她不发现。我还敢打架，嘴巴能说。那个姓谭的地主认为，要陪太子攻书，我是个上等人选。他找到我妈，我妈娃儿一大堆，身边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于是，我在1941年12月来到了重庆。

我同地主的儿子一块考最著名的南开中学，考下来，我中了，他落榜了。他转而考入差一些的广益中学，后来考入农学院，成了一个农业专家。

我在南开读了五年，解放前南开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学校，校长张伯苓的办学思想和方式方法至今令我由衷赞叹——那是培养有独立思想自由意志的地方。

1947年1月（南开读高中时），我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后转入“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专门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并担任地下社支部书记。我活跃得很，演进步剧，发《挺进报》，组织游行示威，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由于我太投入，很快上了黑名单，我只得弃校出逃。那几个月的日子艰辛得很，没钱，没住处，不敢找组织和朋友，东躲西藏，饱一顿饿一顿，不幸又拉肚子，天天跑到面馆里找师傅求面汤喝。这个时候正遇到暑假，我翻进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悄悄住下来。快开学时，学生要回来，又得逃。正在这时学校贴出布告招生，我走投无路，便去考。一考，考中了一——南开中学已给我打下了五年的初、高中功底。这所大学就是政阳法学院。

这时已经是1948年下半年了，川东地下党很活跃，国民党抓得也凶，我几乎没敢在学校的宿舍里睡过觉。这一年多，死里逃生的经历就多了，但我天生机灵，次次逢凶化吉。有一次在七星岗，几

个特务逼上来，只差十几米都让我胜利逃脱。

解放后，我担任了南岸区团委书记，区党委宣传科长等职。在任时我同部下、少先部部长裴秀娟结了婚，她是一个羞涩娴淑的姑娘。1956年，我调到团市委担任宣传部长。

1957年反右，我是团市委常委，反右领导小组成员。随着运动对人的批判和处理，我开始感到反感。说几句话，提一条意见，怎么就成了坏人？这不是明显的以言定罪吗？这不是明显的对起码民主的破坏吗？

我这个人有极强的民主、自由、人权观点，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一、科学救国；二、追随国民党；三、跟共产党走。我选择了最后一条路，这在当时是最艰辛最危险的一条路。为什么？很简单，为了民主和自由。同那个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我非常爱国，一心渴盼祖国富强。我读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读到新华日报的文章，共产党呼喊的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很让我激动，我觉得自己应当为这一个目标奋斗。那时，我认为国民党专制腐败，中国的希望在大力呼喊民主和自由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反右整人，扼杀民主，堵塞言路，与当年共产党大声疾呼的东西背道而驰，与我冒生命危险追求的东西背道而驰，它本能地引起我强烈反感！

我不同意划康中清（市团校教研室负责人，1959年死于长寿湖）为右派，对划黎民苏为右派有看法。对《重庆日报》右派贾唯英表示同情，等等。

我这个人关不住话，心里想什么就要直说出来。1957年8月，我对南岸区委宣传科科长陈适情（他是我的好朋友）谈了我对反右的看法，对以言定罪，以言整人的反感。陈适情在对其他人摆谈时，谈了我的观点。有一个姓张的人把陈适情的话整理成材料告密，陈适情马上被打成右派，天天挨斗。陈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青年，他经受不住，突然失踪了。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独自站在区委下面长江边的一块礁石上，我估计他投了河，至今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那份告密材料也转到了团市委，成了我的罪状之一：同情右派，否定团市委的反右斗争，与团市委常委离心离德（后来定为与党“离心离德”）。

说到这儿，我还说一件与党委“离心离德”的事。

有一次，在团市委常委会上讨论要处理某人某人时，副书记XXX突然说：我们要吸取江北区委（也许是一个大厂的党委，我记不清了）的经验，常委会所有成员要团结一致。

这个“经验”是这样的：该党委布置反右工作，策划让某人来揭发斗争某人。第二天开斗争会，被整的人十分痛苦，大呼冤枉。有一个年轻的女秘书（她头天参加了党委会）受到良心的压力，忍不住站起来揭发党委，说这是头天策划的阴谋。党委书记带头起来说她撒谎，其他党委成员一个个附和，一致认定女秘书撒谎。女秘书孤家寡人，没办法，结果她自己被打成了右派。

要我们学习这个“经验”，就是说，大家要警惕团市委中“女秘书”之类的人，一旦我们的布置策划被某个“女秘书”揭发，大家要向江北那个党委学习，全体否认。

我不知道我在他们眼中算不算“女秘书”，但我对这事极其反感。这肯定又是同党离心离德。

（笔者按：44年过去了，不知江北那帮党委人士是否还健在，他们在面对自己孙儿天真目光的时

候，他们在面对自己生命最后一抹夕阳的时候，是否还想得起那位女秘书，是否会有一丝良心的不安？）

团市委还有一个干部叫旷忠炽，领导反复动员他给党提意见，他老兄就是不敢。最后领导冒火了，警告他：你不提意见本身就是对党有意见，你必须交待。旷忠炽被逼得没法，关在屋里想了一天一夜，终于想了一条他认为最保险、最万无一失的意见——针对伙食团的炊事员。他说：伙食团卖红苕可以剥了皮卖，皮可以喂猪，也不算浪费。

没有划他右派，划的右倾，罪名是“对粮食政策不满，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他被下放到北碚劳动，后来的情况我不了解了，因为没过多久就轮到我头上。

（据黎民苏提供，旷忠炽后来仍住在北碚。）

我的第二条罪状是“反对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7年5月，全国第三次团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四川省团员代表大会选举出席“三大”的代表，重庆共四人，廖伯康、于克书、刘文权、我。在会上，我感到“三大”发扬民主不够（又是“民主”！），例如，我们去时，收集了很多团员的意见，但根本没人听，小组会开了几天，连记录本都不发。我在四川省代表团的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三大”缺乏民主，结束时，我引用鲁迅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无声的会议”。

我被划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降级、降薪，下放长寿湖劳动改造。

我是属于清醒得很早的人，反右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以言定罪整人，我更反感，到我本人当了“反党分子”，我便彻底清醒了——这个党堕落了，这个党与民主自由为敌。

到长寿湖后，我被分到捕鱼队，这是农场里最好最实惠的劳动单位。这得感谢罗广斌（即小说《红岩》的作者），他是团市委统战部部长，下放下来当副场长，在团市委时我们俩是好朋友。他有心照顾我，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从小就是水中的好手。他说，那好，你到捕鱼队去。

我在长寿湖，一开始就没有心理负担，我心里明白得很，反右肯定错了，共产党肯定错了，我谭显殷没错！不敢公开反抗，我就把我小时候的鬼机灵和解放前地下斗争的本领施展出来同他们斗。我是团市委打的职务最高的右派，我告诉团市委这帮难兄难弟，如曹贞干、高志长、黎民苏、李普杰等，咱们一定要抱成一团，决不要互相揭发，互相斗，谁要是去“汇报”，大家群体攻击他，孤立他。那时我已经看清了共产党的整人术：老是挑动一些人整另一些人，让人们内部互相起哄，他坐收渔翁之利。我告诉他们，咱们要活得轻松，要少挨整，一定要团结，要想办法同他们斗，不要咱们自己内部斗。我们这帮人抱成一团，少吃了不少苦。

大饥荒那几年，我对难兄难弟说：私人的东西咱们绝对不要动，公家的东西，能吃则吃，能偷则偷，湖里的鱼，不能吃？国家财产？屁！咱们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大多送到那些官员的私人餐桌上，我们劳动者反而不得食？饿死？休想！

那几年的故事就多了。

1961年的一天，我去赶场，突然有人扯我的裤腿，我回头一看，是一个瘦骨嶙嶙的小女孩。她大约八、九岁，脸像张白纸，一双眼睛又大又圆，里面全是哀求。“叔叔，求求你，带我走吧。”她的

声音像一只小猫。我问她，“你妈妈呢？”“饿死了。”她说话有气无力。“爸爸呢？”“也死了。叔叔，我跟你走吧，我会洗衣服，我帮你洗衣服。”

我心里一酸，把她抱起来，我一下子想起自己的女儿，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收养她！喂她点小鱼她就能活下来。旁边一个右派说：老谭，放她走，我们哪个敢收留她呀。

我一下清醒了。

我把她放下来，掏出五角钱和二两粮票塞到她手里，对她说：“你到前面食店去吃碗面。”她一把抱住我的腿，抬起头，睁着像猫一样哀哀的眼睛望着我。

我转身逃亡一样地走了，她还在后面叫：“我会洗衣服，叔叔，不白吃饭……”我不敢回头，眼泪夺眶而出。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

1960年，饿归饿，阶级斗争抓得紧，那一年春节前，上面宣布，长寿湖所有右派分子不准回家探亲。这对我们是一个沉重打击，“分子”们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眼巴巴就盼望那几天假。我打鱼时，捞到小参子鱼，总是细细剖了，晒在船蓬上，晒干后春节带回家。每剖一条小鱼，都让人想起家，想起妻子儿女。听说不准探亲，右派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我望着那一包小干鱼，发呆。

捕鱼队队长金践之是摘帽右派，我的好朋友，他虽然没成家，但有个母亲，他挂念得很。春节一天天临近了，金践之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对其他右派说，有一些事必须要到狮子滩去，由他同我去办，两、三天就回来。金践之是队长，有点权。

当天晚上，天黑之后，我同金践之各自挑一担年货溜到湖边，上了早已准备好的船。从飞龙划到狮子滩，要整整6小时，我们俩憋足了劲，拼命划。天，黑沉沉的，静得很，只有桡橹吱吱呀呀的声音和哗哗的水声。划到狮子滩，已经是下半夜，我同金践之弃船登岸，挑起担子飞走。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有60多里路，我们必须在上午一早乘上到重庆的船。

那一阵好走！大约凌晨5点左右，我们俩实在来不起了，爬上一个山坡，看见一堆谷草，倒下去就睡。金践之突然坐起来说：“不能睡，不能睡！东西遭偷了就惨了。”我顾不得了，呼呼入睡。金践之硬挺着，坚决不闭眼，一心一意守着年货。那年货我记得是几个老南瓜，十多斤红苕干，一包小干鱼，还有些包谷……

1962年下半年，我调回重庆，身体好好的，精神也没垮。我回来后，带妻儿老小去照了一张全家福。那张照片上，就我一个人最神气，完全不像是“释放”归来。当然，家里遭得很惨……

裴秀娟（谭显殷之妻）：老谭1958年去长寿湖后，几年里，家里死了三个人。那时，上面三个老的，下面三个小的，经济很紧张。1958年我父亲得病，无钱医治而死，1960年小女儿饿死，1962年我妈妈上吊自杀。

我最难过的是我妈妈。

饥荒年家里不准烧火，只准吃集体食堂。食堂在江边，我家在半山腰，我妈是小脚，身体又差，不管刮风下雨，每顿饭都要下一大坡去打饭。饭只有二两，吃完饭爬坡回来，累不说，又饿了。

有一次我下班，正好看见她爬坡回来。她右手支一根竹杆，左手拿一个碗，目光呆滞，我想起鲁

迅笔下的祥林嫂，妈妈和祥林嫂一模一样。

我妈是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她每天都要留一口粮食，哪怕一个小土豆，给她的孙儿。她身体垮了，脱肛，直肠垂落在肛门外，每次都要用热毛巾捂住肠子，慢慢把它托回去。她觉得自己活着是个拖累，便萌生了死意。1962年7月28日下午，她吊死在木床挂蚊帐的横栏上。那个横栏很细，她吊上去竟然没断——只有五十多斤了，皮包骨。

我抱着她的身子大哭，她头一天说过她想吃一片扣肉——那是她在人世的最后愿望。

（裴秀娟满眼含泪。）

谭显殷：1967年，我又被抓回长寿湖，算是“二进宫”吧。

1962年我回来后，在南岸海棠溪一个油毛毡棚子里卖菜。1967年2月22日，一帮人突然闯进家来，叫我马上收拾东西到长寿湖办学习班。

凭多年的经验，我知道来者不善。一个月前，罗广斌也是突然被带走，没几天就传来消息：罗广斌畏罪跳楼自杀。他妻子胡蜀钦亲口告诉我，她绝不相信罗广斌是自杀，她了解罗。还有，罗死之前的一天还带信叫她送牙膏等生活用品。说不清了，这事至今都没有定论。

我预感到我很可能要步罗广斌的后尘，文革来势凶猛，打人、杀人、死人的事天天发生。要轮到谭显殷头上了？！

但是，我很镇静，我悄悄对妻子交待了三点：一、如果我死了，不要相信我是“畏罪自杀”，我绝不自杀。二、三个娃儿要抚养成人。三、我母亲要养老送终。

我强调第一点，就是为了避免像罗广斌那样死了说不清楚。

在解押去长寿湖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次为什么抓我？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被他们整死还是找机会逃跑？当然逃跑！怎么逃跑？

与我同时被抓的还有一个叫陈孟汀的右派，他当年是延安抗大的教员，一个老革命，很有理论水平，也很顽强。到狮子滩时，我们俩趁解押人员不注意，悄悄约定，如果我们两人中有一个死了，另一个要负责把情况告诉对方家庭。我俩还交换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各自的家庭地址，还特别注明：我不是畏罪自杀。

当天下午到了同心岛。一上岛，正遇上一群右派在打捞尸体——一个叫李思强的人在前几天的批斗会后跳了湖。我认识李思强，1956年他从团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调到市委宣传部，我接他的班，他是我的前任。看见他肿胀的尸体，我心里噗咚一跳：我这次来要步他的后尘？

第一次审问下来我就明白为什么抓我了——为了罗广斌。

罗广斌写了《红岩》，算个名人，整死了有点不好说，于是想整一个“反党集团”出来，罗广斌属于这个反党集团，既然是坏人，那就死有余辜。

他们原定抓四个人，除我和老陈外，还有作协的李南力和孙静轩。李南力被抓后，半夜逃脱，当夜在储奇门江边躲了一夜，第二天过江往贵州方向逃得无影无踪。成都的孙静轩正同造反派打得火热，抓捕的人没敢下手，结果只把我和陈孟汀抓来。

他们要我写揭发罗广斌的材料，我写了一份交上去。审我的人一看，气势汹汹地说：“你这哪里

是揭发材料，你还在为他涂脂抹粉！”我说：“审判员同志，你们是要我按照我了解的情况写呢，还是按你们的特殊需要写？如果是后者，我做不到。”

我特别强调了“特殊需要”几个字。

这一下惹得其中一个人跳起来，他一拍桌子，厉声说：“你口硬，谭显殷！我听说过你这个人，刁！但是你还不懂得我，你还没认清此时此地，我要整得你血红血歹！你休想回去！”

这是暗指要我死在这儿？

“认清此时与此地”这是白公馆、渣滓洞里的语言，当年我要是被国民党抓进去，就该听到这句话，现在，它出自一个共产党监管干部之口。

这个人叫孙X，长寿湖监管右派的主任。

斗我的大会，声势很凶猛，但没怎么打人，我只挨了几脚。这得托李思强的福，他的死让那帮人收了点手。

会上宣读揭发我的材料，是我一个右派朋友写的。他写道：1960年的一天，我和谭显殷夜里从狮子滩划船到三台，我在船尾，谭在船头，谭显殷望着夜空，面色凝重，意味深长地说：“天，快要亮了吧？”我说：“不会吧，还没听到鸡叫。”谭显殷恨恨地说：“大跃进以来鸡都死光了。”

下面一片喊打喊杀，我立马挨了几脚。

共产党的批斗会有一个特点，专门要点与被斗者相好的、关系亲密的朋友站起来揭发。

我那帮难兄难弟一个也跑不脱。高志长被点起来揭发我，他憋了半天，揭发说：有一次我和几个人到谭显殷家里去，他端出一盘黄豆招待我们，他说，对不起了弟兄们，只有点黄豆招待。谭显殷说这种话，分明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认为社会主义缺吃少穿……

第二天上坡劳动，高志长看见我，眨了一下眼，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我明白他的意思：对不起了，老伙计，没办法。

一连斗了我一个月，白天强迫劳动，晚上斗争会。孙X放言：“谭显殷，你听清楚，落在我手里的人还没有不败下阵来的。”另一个“审判员”郑修成要温和些，他说：“你跳出来吧，揭发，你不是主要的。”他想分化我，我暗自好笑。他又说：“我还没见到像你这样顽固的人，居然一个都不揭发，还不认错。”我回答：“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们两个认识不一样。”

斗陈孟汀，他也是个“老顽固”，绝不认罪。

其实岛上这些人斗，我挺得住，担心的是红卫兵进岛，这些杀红了眼的年轻人，无理可讲，我和老陈这点顽强和斗争经验，是秀才遇到兵。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天天冥思苦想逃跑的方法、路线，两个月过去了，无机可乘。

同心岛上有一个叫马鞍山的地方，我观察到，在马鞍山脚一个水沱里，晚上有时停有一条小船。我打上了那条船的主意，脑子里详细制定了一个逃跑计划。我要往与重庆相反的方向逃，还得带上陈孟汀。陈年龄比较大了，又不会划船游泳，还有，他是在延安平平安安长大的，我是重庆地下斗争的出身，比他有办法。我如果一个人跑了，他肯定更受罪。

我悄悄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很担心，说到处是水，难度大，风险也大。我让他放心，说我自有

办法。老陈同意了。

我暗暗作准备，先托曹贞干买来一对电池，又向詹光借了一个电筒。连续好多天，我白天观察山势地形，记方位，半夜起来看，进行校对，晚上看了，白天又校对。有人看管我俩，但看得不紧，看管的人也是“分子”，其中一个就是金践之，我告诉他我要跑，金践之不动声色，暗中助我一臂之力。

逃那天晚上，还斗了一场陈孟汀，批斗会结束后，回到工棚已是半夜十二点。

一点左右，我开始哼哼，声音由小到大：“肚子痛哟，唉哟，肚子痛哟。”我一边哼，一边看反应。没人理，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开斗争会，累得早进入梦乡。我轻轻下床，对着门栓冲了泡尿（免得它响），然后悄悄开门溜出去。我摸到老陈住的地方，按计划拉动从窗里伸出的一根细麻绳，然后伏在地上等。不一会儿，老陈夹着一个包袱，猫一样地溜出来。我们俩弯着腰，轻手轻脚往湖边走，没有月亮，但路熟，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船边。

上了船，才发现没有桡片！这一惊非同小可。老陈慌了，说，趁还没被发现，赶快溜回去。

我想了想说，不，你趴在船上别动，我去想办法。我返身往山坡上摸，打算找一根插四季豆的竹杆。我在茅草丛中钻，生怕遇到豺狗和蛇，为了逃命，顾不得了。

我找到一根竹杆，又拔了两根备用，然后返回船上。我在船尾一边划一边辨认方向，长寿湖到处是水湾水沱，稍不留意就要迷路。船走得太慢，我于是叫老陈趴在船头用盅子划。

整整划了两个多小时，我全身都被汗水打湿了，包括裤腰带。

我们在垫江县的地界弃船上岸，沿着一条小路往垫江的白家粮仓走。1959年我在捕鱼队时往那个方向走过一次，记得翻上坡有一棵黄桷树，过了八年，又是夜晚，我一路担心，怕走错路。

四下伸手不见五指，那把电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走一段我就关掉电筒，蹲下来借天空的背景看山形，还好，我找到了记忆中的黄桷树。从黄桷树到白家场有15里，走到白家场天还没亮，我们不敢停留，急匆匆又往严家场赶。我们两个的鞋子都走烂了，脚打起了泡，我们干脆把鞋扔了，赤脚走。走到严家场是早上八点钟，铺子开门了，我们各花两块五买了一双胶鞋，然后坐到馆子吃早饭。

我要了四两烧酒，炒了一大盘鳝鱼，还有两个蒸笼，一钵汤。嘿，那个鳝鱼才叫好，四角钱满满一大盘，店老板说，当地黄鳝8分钱一斤。

如此便宜的上等货，怎能不吃！

老陈十分着急，四下张望，生怕有人追上来，他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这个人就是贪杯！这个时候了还要品酒！快点吃，吃了走！走！”

我胸有成竹地对他说，我算好了，他们起床后发现不见人，还得找一下，八点钟出工还不见我们，才会断定我们逃了。汇报上去，再打电话到狮子滩，折腾下来至少半个多小时。还有，他们主要的拦截方向肯定是通往重庆的公路码头，不会想到我们反方向逃跑，我们有时间好好吃顿饭。

事后证明，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吃完饭，上路，这一走，又走了30多里，走到高峰场。一个饭店的招待员说，下午有一辆过路班车到垫江县城。

实在走不动了，两个多月的连续劳动和批斗，一夜的紧张奔命，把我们累垮了。

下午四点来了一辆客车，我们搭上车，天黑前到了垫江县城。

县城里一片喊打喊杀声，高音喇叭吼得震天响，火药味很浓。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两派正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打斗得难分难解。

我一看这阵势，心中暗喜，对老陈说，放心放心，今晚不会有事，他们打得越热闹我们越安全。

我们找了一个不起眼的鸡毛店住下来。我带得有菜站的工作证，店主把我们当成重庆来的客人，热情迎到楼上住。

当天晚上，我还溜出去看了一眼垫江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第二天一早，乘车继续往北，到了梁平，住一晚又乘车到大竹，从大竹又到邻水，最后回到重庆。

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让那些在狮子滩，在长寿码头，在朝天门追捕的人白忙一通。

我同老陈在市中区分手，各自回了一趟家。第二天，老陈逃往北京，我逃往成都，我在成都呆了大半年，确信没危险了才回到重庆。

1979年，大形势让我“重新做了人”。市委组织部的人找我谈话，问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我说，四年鱼贩子，一年流浪汉，十六年菜贩子。他说，算不错嘛，活出来了嘛。我说：“是呀是呀，托共产党的福，我还健在。”

“改正”后，我进入市委宣传部，后担任了副部长、高等教育办公室主任，又干了十年。

八十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我很振奋，以为共产党有希望了，那些年，我没日没夜的干。八十年代后期，我又觉得不对劲——以权谋私、官倒捞钱愈演愈烈，但真正给我当头一棒，让我“痛醒”的是“六四”的枪声！

我年轻时就是专搞学生运动的，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是学生运动的主旋律，也是我青年时代生命意义所在，1989年我老了，但当年的精神和追求仍在。

我没料到当局会对学生动用坦克机枪！

我年轻时加入的这场革命是历史的一个大错误，一个大悲剧。

九十年代初，我担任市人大教科文副主任，到专县去视察教育。不少地方拖欠教师工资，有一个学校的教师半年多没领到钱，一位教师的儿子因长期营养不良，夜夜尿床。我听得火冒三丈，指着那些官员的鼻子说：“我告诉你们，当年国民党撤离大陆，都是发了钱才走的，没有欠教师一分钱！……”

但是，我已经老了，上几步楼就喘气，医生检查，说我共有九种病。

不过，我儿子年轻，精力好，他民主、自由、人权的意识很强。“六四”镇压之后，他情绪极其低沉，我安慰他说：“这个政权现在是靠刺刀来维持，但是，一个靠刺刀维持的政权能走多远呢？”

咦，我又错了，现在12年过去了，一切如旧。看来，争民主自由的路还很漫长。但是，我坚信中国一定要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我年轻时的追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一定会实现。

只是我看不到了。

（采访时间：2001年4月18日，地点：重庆市渝中区）

在父亲谭显殷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讲话

谭松

在守灵的最后夜里，我独自走到父亲的灵柩前，久久地注视着他宁静的沉睡。

眼前是我太熟悉的面容，也是我太熟悉的沉睡——我真的觉得他是在沉睡，他还会醒来，就像他曾千百次地醒来，又扬着他长长的眉毛，目光烁烁地同我侃侃而谈。

他曾向我谈到他当年为什么走上革命道路。他说，在他学生时代，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一、科学救国；二、追随国民党；三、跟共产党走。他选择了最后一条路，这在当时是最艰辛最危险的一条路。为什么？很简单，为了民主和自由。他说，同那个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他非常爱国，一心渴盼祖国富强。他读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读到《新华日报》的文章，共产党呼喊的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正是他的追求。

他还向我谈到他在地下斗争和在长寿湖劳改时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

我还记得他对我的一次厉声责骂。那是1992年，当他得知我离开学校到了重庆国际公司时，非常不满。他说，为什么要放弃教书育人而下海去挣钱。接着他厉声说：“谭松，你要记住，我们谭家从来没有钻到钱眼里！”

我还记得他离休后分得了一套福利房，个人需交两万五千元。他把我找去，希望我们几个子女帮助他，因为他的全部存款只有几千元。

在他的所有子女中，没一个借助他的臂膀升官、发财、出国（他的五个子女都在国内）。他没有给我们留下香车宝马、万贯家财，但是，他传给了我们一种珍贵的财富，这就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品质。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我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从此，他每天上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国际国内新闻。我每次回家同他交谈的主要内容便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

（写到此时，我突然听到细细的鼾声，鼾声以呼吸的节拍从灵柩里传出！我浑身一震！倾身细听，真真切切！！我看了一下表：凌晨3点正。

鼾声持续了5分钟，在3点零5分消失。）

我更记得在他离休后的晚年里，他多次同我谈到他年轻时的追求——渴望祖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这也是他一生的渴望和追求。

越到后来，我越觉得我们不仅是父子，而且是朋友，甚至是战友。

昨晚，有位朋友匆匆赶来，在所献花圈上写下这么两句话：“一身正气浩气长在，平生坎坷求索不已”。这同我前天夜里写给父亲的挽联“长路坎坷守浩然正气，一生曲折怀磊落胸襟”刚好一致。我想，这绝不是对亡人的溢美之辞，而是对父亲一生的公正评价。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先后采访了四五百人，其中包括我父亲。在我记录他的口述中，结尾是这么一句话：“我坚信中国一定要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我年轻时的追求一定会实现。只是我可能看不到

了。”

在守灵的最后一夜里，我掀开复盖在灵柩上的绸布，将脸贴在玻璃上注视着他。我离他这么近，中间只有薄薄的玻璃相隔。我突然觉得，我仿佛能唤醒他，他也能听到我的呼唤。

但是，这抬手可及的距离却是永恒的阴阳相阻。

我似乎不能接受这命定的但却无情的现实，我无法想像眼前这个给予了我生命的躯体将在几个小时后化作袅袅青烟。

从此，有形的父亲将永远消失；

从此，我能看见的，只是长江南岸莲花山上一块冷冷的碑石。

用什么来化解我内心绵长的忧伤？

用什么来抚慰父亲天上渴盼的灵魂？

我愿有一天，我狂奔到父亲的墓前，举手向天，泣血顿首——

“爸爸，您一生的渴望和追求终于实现了！”

写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凌晨 2：30—3：30 重庆石桥铺殡仪馆父亲灵柩前

我在“三反、五反”中当新闻官

文履平

按：原长寿湖渔场“右派”难友、《重庆日报》老记者文履平前不久病逝。本刊特选发其生前自编新闻文集《跋涉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 8 月第一版）“自序”中的一节文字以示怀念。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文履平（1925—2012），四川合川（今属重庆）人。抗日战争后期在育才学校文学组学习。1946 年初毕业离校即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的地下工作（以后加入中共）。1946 年秋以重庆《国民公报》编辑社会职业为掩护从事学生民主运动，先后参加过地下党重庆市委机关刊《反攻》和机关报《挺进报》的工作，还为南方局青年组和四川省委先后领导的公开报纸《中国学生导报》作过编辑。1949 年冬解放军接管重庆时即参加了军管会新闻处工作。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创办时即调入担任记者直至离休。但其间有二十余年被作为“右派”打入另册。

重庆解放后我在军管会新闻处参加接管工作。军管结束后还是在新闻处，不过不在军管会而是在市政府了。这个工作专门统一发布公告和公告性新闻，于是就当上了同行记者们不太欢迎的“新闻官”，板起面孔说话。这其实是换一个说法的新闻管制，从感情上说是我所不愿意干的。这种新闻其实也没有什么写头，无非多半是把政府公报改头换面一下，以新闻的形式公之于众就是。另外就是参加多种会议，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几次都是我去参加的，向例都是由我担任宣传组长，既要组织各个单位派

来的记者采访，还要自己执笔撰写公报式的新闻。这种新闻，全国有新华社通稿的模式，我们地方新闻只是照作翻版之举，写去写来了无新意，日久也就心烦了。于是就发起牢骚，说是这种稿件不必多写，只需印发一个表格，把时间、地点、事由这些栏目空起，照填不误就是。这当然是“怪话”。这些话自然就成为日后我当“分子”的罪状之一。

在“三反、五反”的时候，我还以“新闻官”的同等身份，当上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办公室的宣传组长。对外接待记者，发布公告新闻，自己也还可以选择一些大案、要案来作专题报道。但是，这后一项看来是很为紧要的事情，我事实上并没有去做。因为在采访过程中跑着、跑着，思想上又抛锚了，产生了惑疑。

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向各行各业派出了十个检查大队，是由市级各单位抽调来的精兵强将，大队长都是团级干部，任务是“打老虎”（即挖掘对国家财产的盗窃犯）。在检查人员的带领下，在工厂、商店纷纷由工人、店员参加，召开大型、小型的检举揭发会，对盗窃分子展开而对面或背靠背斗争。这急风暴雨式的斗争，很快就结出成果，大、小盗窃分子不断落马，而且仿佛滚雪球式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反观工厂、店铺，由于大半都在歇业或半歇业，市面一派萧条，行人、车辆都日渐减少；而且还不断有人自杀。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眼看材料、耳听汇报，还在大街上行走，连解放碑一带的繁华地段，都感觉得空落和冷清。我曾到剧场去看过戏，偌大的剧场里只有几个稀少的看客，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些。我曾听到一个有名的演员摊开两只手说：这个戏还怎么唱得下去！

四川人都知道，成都人喜欢喝花茶，重庆人喜欢喝沱茶。云南沱茶在重庆的销路很好，云南最大的茶庄“允昌祥”，在重庆设立了一个生意兴隆的分号。就是在这个茶庄里，挖出了全重庆最大的一个盗窃犯。

这引发了我的兴趣，于是就走到这个大队的大队部去。大队长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青人，他是从西南军区借调来的团政委，我向他说明来意，他也看了我的证件，然后郑重地对我说，既然你是宣传组长，我就向你谈情况，看材料，一般记者我是不接待的。

从材料上看，发现这个盗窃犯所窃取的总数，加起来超过这个茶庄总资产、总营业额的好几倍。我问这位队长这该如何解释。他说，所有的数据都是他本人一笔、一笔地交待出来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但是我却不信，对这个案子一个字都没有写。最后核定下来，这个所谓的大盗窃分子，不单不是老虎，连猪儿、狗儿都不是，只能勉强算是一只小耗子，结论是半守法半违法户。

显然，年青的团政委是为这个称之为奸商的交代所蒙蔽了。由于他的不懂经济，不知道企业经营的奥秘，再加上急于求成的好大喜功，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从而制造出了冤、假、错案。

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几乎历年都是运动不断，给人以一个仿佛不搞运动就不会过日子的感觉。而前后各种运动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重锤几乎都是插向知识分子的。实际从全国人口的比例来看，知识分子所占的数额本来不高，应该说是比较稀缺的。在接连不断的重锤打击下，一部分人固然被打翻在地，而多数也噤若寒蝉，不敢再来置喙了。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无声的国家。

这种运动焉能治国？我是从惑疑逐步走入异类，最后也没有逃脱运动的厄运。

文履平生前书信一封

按：这是文履平在 2007 年读了《长寿湖边一滴水——原重庆长寿湖渔场一份“右派”名单研究》一文作者何蜀向他征求意见的文稿后写的信（该文定稿后发表于 2010 年 2 月 25 日出刊的《往事微痕》第 41 期重庆专集），信中对文稿的修订提出了一些意见，并对当年长寿湖渔场“右派”生活作了一些颇有历史价值的回忆。

何蜀同志：

可能你对当年的历史背景材料不够了解。我在这里提出一些来供你参考。

58 年市里决定以各个系统划分，在全市建立 8 个下放干部农场，其中我记得有市委系统在长寿湖，市府系统在南桐海孔洞，还有长航、民航在通江。

我们报社属市委系统，记得是 4 月份到的长寿湖。开始我们（老右）还是和报社的下放干部在一起的。也并没有说有什么不同的对待。但一到农场后即由农场决定混合编队，把各单位的人拆散到各个生产队，我们（张××、金××和我）三人分在种畜场，参加新修猪牛圈的工作，主要是抬石头和打杂。上队的第一天，队长就宣布：你们几个右派分子，是来接受监督劳动的，队里人人都是可以监督你们，而你们只能接受监督，服从改造，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这一监督就是 18 年之久。

当时我们都傻眼了。因为我们都是受的三降（降职、降级、降薪）处分，不属监督劳动之列。公布的必须是极右分子才是监督劳动处分，并接受劳动教养。怎么一来就改变了？于是有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其实这些下放干部农场，看来都是有欺骗性的，不出三年，都纷纷变性质了。长寿湖的办法是，下放干部前后分期陆续抽走，除留下几个骨干以外，直接劳动的场员，都先后由市里的知青来顶补。农场的招牌不变，仍然是国营性质。不变的只是这些在此劳动的老右。改造似乎遥遥无期。

后来先后有别的农场比如通江，干脆撤销以后，下放干部全部调走，老右则全部转到长寿湖来。这就是后来此地人员单位比较芜杂的原因。

改右学习班是 62 年初成立的。那就是把全场各单位分散的右派，都集中到一起来学习，等待分配工作，而且以后确也调走过一些人。但后来不久，却停止了。当时不知道原因，现在知道，是在北戴河会议后，强调阶级斗争，又把这一些人凉起来了。

这个学习班一办就是 14 年。其实也是农场的生产单位。年年承担生产任务。以外好像并无特别的目标。前途渺茫得很。我们曾经自嘲：这可能是古今中外办得最长的一个学习班。连续计算下来，已经够上了几个大学了。

难怪人们就经常抱怨了。我清楚记得新华社重庆分社的三个负责人之一、记者王华东感叹：“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年华都虚耗在长寿湖了。”当然这样的牢骚话是不能随便说得。泄漏出去起码要挨斗争。他和我之间有这种互信，可以说些二话，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我也马上递眼色给他，要他不可乱说。他也立马知趣不言。

其实大家何尝又不都是这样想的。你从分析中已经看出来了，这些人相当部分都是原单位的业务骨干，他们又正在年富力强之时，正是可以大干一场的时候，却无端被夭折了。从工作，从个人来讲，

都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是无法弥补的。苦闷是普遍的，也是最为折磨人的。有的人年纪轻轻地就死去了。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说最高降五级不准确，我就降了六级。有人是降到什么级都没有后，每月只有十几元生活费。这在当时是无法过日子的。有不少人在冬天没有棉衣，平常也穿得像个乞丐。占一之、赵万仞，那是特例。只降了一两级工资，当然就是最高级了。把这两个人的工资拈出来，当然就把平均数抬高了。实际平均数应该在 40 元以下。如果拿这个数与机关干部的平均数一比，其差距是很悬殊的。确实可以这样说，这是不让这些另类的人，可以过得上平常的日子。

然而，如果再从劳动量上来说，应该说大多数日子都是在超负荷运转的。说得严重一点，是不把人当作人看。任你如何努力都得不到一个好字。而指斥和责难，则是随时随地都摆着的。

如此生活条件很差，劳动条件很重，长年累月下去，有些人，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了。如果能够统计出来一个数据，那死亡率可能是惊人的。记得 61 年冬天，我在桐子沱队，这个季节队里死亡 6 人，都是右派。全队不过总数 60 多人，比例可谓不小。

再说离婚，100%都是被迫的，没有一对是自愿的。有一个反证：这些人后来都复婚了（除了中途已经另外结婚的），张天授的例子还有一句是，对方是个团员，组织出面对她说：划不清界限，团籍还要不要？方才最后作罢。

至于戴帽子的理由之荒唐，简直有些使人不敢相信。有一个例子：朱汝鳌是个留用的旧人员，鸣放时，领导人再三动员他讲，他开头一直不说，到最后几乎是半哄半逼出来的 8 个字：“经营不善，管理不当。”这对那个工厂来说，确实就是实情。即或退一步说是讲错了话，那和政治也沾不上边，为什么要戴反党帽子？

还有一个人叫谢汝卿，这是一个完全不懂什么叫政治的人，连起码的常识都很缺乏，可以说是没有文化。比如说读报纸，读到某个地方的斗争方兴未艾的时候，他会插上一句：“怎么又是这两个人？简直是坏透了！到处都在捣乱。”弄得大家讶然。后来方才弄明白，他他是把这当作两个人了。诸如此类的话几乎张口就来，弄得有一次有一个右派发火了。这种人都当了右派，简直不够资格。应该说这是他那些单位为了凑数把他凑起进来的。

好，就这些了。本来还可以再写的，我的精力不够，而且写起来也很吃力，既看不清楚，又手发抖，写得不成样子，有许多字恐怕要你去猜，很抱歉，但我已经尽了力了。

这些只是提供一些情况，供你作为参考。问好

文履平 9.30（2007 年）

“解密”和“还原”掩盖了什么？

——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兼答张颐武教授

申如 若水

2011 年 6 月，一本名为《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的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封面上几行出版说明非常引人注目——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庆祝建党 90 周年重点读物，“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该书的两位作者也不是一般人物，第一作者何建明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第二作者厉华为重庆市文化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是闻名全国的红岩故事宣讲者。

这样一本书的出版，对于我们这些 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红岩》迷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今天，与小说《红岩》题材相关的作品一直不断有新作问世，这些作品的作者，既有歌乐山英烈的亲友，也有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还有专业党史工作者，这些作品对我们了解真实的历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遗憾的是，近些年来，我们觉得这一题材的图书似乎进入了新作不断、佳品鲜有的阶段。2011 年是中共建党 60 周年，我们很愿意相信，《忠诚与背叛》会是一部高质量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还原历史的佳作。但是，那句被人说过无数次的老话这次又应验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与小说《红岩》相关的这段历史近年来大热，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表面的热闹背后，我们看到了对真实历史的曲解和愈演愈烈的加工演义。因此，《忠诚与背叛》的大炒冷饭以及在史实方面存在的诸多谬误，对我们来说也不算是一件多么出乎意料的事情。倒是该书出版后在新浪博客看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专门撰文高度评价这样一本书，令人颇有些惊讶。以前只知道张教授是文学教授，却不知他对这段历史也有兴趣。在网上与他对话之后，他告诉我们，他之所以高度评价《忠诚与背叛》，是从他自己的专业，也就是文学专业出发的，至于这本书的史学价值，张教授认为，这本书的第二作者是“红岩”历史的研究专家，上过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在历史问题上应该不会有谬误，当然也可能会有点“小错”。张教授还说，如果不把对这本书的指谬写成文章，就不可能“形成学术观点”，批评它错误百出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我们认为张教授的话有一定道理，因此不揣浅陋，试对这本书中存在的问题略加分析，希望能够得到张教授的批评指正。

一、是重写还是重编？是挖掘还是组装？

《忠诚与背叛》的作者称他们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以革命的名义，让真实的‘红岩’永存”（《忠诚与背叛》405 页），并且还说：“正是这种责任，才使我们拿起笔杆，……写就一部全新内容的‘红岩’。……我们自然期待所有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能够阅读本书，并从中悟出一些基本的和深层次的道理，以此来考问和检验自己的灵魂，规正和警示我们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重写‘红岩’、挖掘真实的红岩故事的全部目的。”（《忠诚与背叛》406 页）。这样的叙述，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本原创性非常高的党史类图书。然而，阅读过全书之后我们方知，全书但凡涉及史实的，至少 80% 的内容都是以前就已经披露过甚至屡次披露过的东西；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还有不少内容是作者的想当然或凭空杜撰。

不错，《忠诚与背叛》中的确有相当多的内容是真实的，可是这些真实，早就有其他作者不止一次地告诉过读者了，就算是《忠诚与背叛》愿意再告诉读者一次，也应当列出参考文献的详目，以示对原创者的尊重。《忠诚与背叛》中涉及江竹筠、许建业、陈然、刘国鋋、齐亮、张露萍、胡其芬、蔡梦慰、蓝蒂裕、张学云、丰炜光、陈俊卿烈士的内容，至少在以下文献中基本上都出现过（按出版年代排序）：

《撩开神秘的纱幕——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杨顺仁著，重庆出版社，1978 年。

《江竹筠传》，卢光特、谭重威执笔，重庆出版社，1982 年。

《英烈颂》第一、二、三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出版社，1982～1987 年。

《陈然烈士传略》，蒋一苇、陈崇基、林彦著，重庆出版社，1983 年。

《刘国鈺》，曾紫霞著，重庆出版社，1983 年。

《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张露萍传》，施文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年。

《红岩春秋·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烈士殉难 40 周年纪念特刊》，《红岩春秋》杂志社，1989 年。

《铁窗风云》，钟修文、李畅培、厉华 编著，群众出版社，1997 年。

《红岩恋——江姐家传》，丁少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

《血火铸丰碑——解放前夕中共川东、川康地下组织斗争纪实》，杨喆著，重庆出版社，2005 年。

《忠诚与背叛》涉及渣滓洞女牢情况、涉及白公馆男牢“制作红旗”的情况、涉及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情况的内容，至少在以下几种文献中基本上都出现过：

《狱中斗争纪实》，傅伯雍、张正履执笔，重庆出版社，1984 年。

《红岩女英烈》，四川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1986 年。

《红岩魂——纪念 11·27 烈士殉难四十五周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红岩春秋》杂志社合编，1994 年。

《挺进报》，文履平、邓宣、厉华主编，群众出版社，1997 年。

《红岩魂纪实系列——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厉华、陈建新、刘和平、王庆华著，群众出版社，1997 年。

《红岩魂纪实系列——来自歌乐山的报告》，厉华著，重庆出版社，1999 年。

以上文献的信息，在《忠诚与背叛》中都未曾出现过。当然，《忠诚与背叛》在某些地方也给出了少数参考文献的作者和题目，但是给出了全部信息的文献少而又少。全书大段引用文献原文长达 8 页的地方是关于刘国鈺烈士的两次被捕，这段 7000 余言的文字来自曾紫霞撰写的《刘国鈺》（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1992 年再版）一书，而《忠诚与背叛》却含糊其辞地称这段文字来自曾紫霞的自述，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这自述是何建明副主席从尘封的档案里挖掘出来的宝贵史料（何建明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了他对烈士档案的挖掘工作），殊不知这已经是一版再版而且为许多相关题材的图书和艺术作品广泛吸收引用的著名史料。不要说是原创作品，即便是编著作品，在正文中连续 8 页引用他人的原文，也实属罕见。

作者声称自己挖掘了真实的“红岩”史料，我们不否认作者的确也有所“挖掘”——书中有些烈士书信和烈属回忆我们的确是第一次看到（其实我们是第一次看到也并不能证明这些材料以前就未曾公开发表过，这里姑且以我们有限的所见作为衡量作者是否有所“挖掘”的标准吧），但是这些材料在全书所占比例少得可怜。总体说来，作者的主要贡献是“拼装”而非“挖掘”，也就是把早就公开发表的第一手材料进行裁剪粘贴，然后成书，这样的拼装，在这一题材的图书史上早就不是第一次（上文我们列举的一些文献也是“拼装”类型的）。我们并不否定“拼装”的意义，在某些时候，把散落的信息进行有机的整合，集中起来贡献给读者，也算是做了好事。而且，拼装本身就是一个技术活，有些拼装很成功，有些就很失败。《忠诚与背叛》是否算是成功的组装，我们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有一点是无需讨论便可以肯定的：设若一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用其他已经公开发表过的史料编辑而成，该书就属于“编”或者“编著”而不是“著”，即便是“用革命的名义”，也不能把 80% 以上的内容都已经是旧闻的编著粉饰为“全新内容的‘红岩’”。

二、无法忽视的谬误

在谈及《忠诚与背叛》出现的谬误问题时，张颐武教授先是说：“这方面厉华是这一领域的专门研究者，掌握不少第一手资料，也在百家讲坛讲过这方面。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只是从我的专业角度发言。但没有看到对于他们的史料方面的质疑。我自己的看法是基本可靠。”（参见新浪张颐武博文“从生命中探求和思索——《忠诚与背叛》的价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83f2d0102dqv0.html#comment1），然后又说：“史料的详实具体是最基本的。当然一点小错也没有不可能。”那么就让我们来稍稍分析一下《忠诚与背叛》中的那些“小错”吧。

1、关于著名的罗广斌的《狱中报告》

《忠诚与背叛》称，罗广斌著名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是厉华（《忠诚与背叛》的第二作者，张颐武教授所称的“红岩”研究专家）发现的，该书用三个自然段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厉华先生发现这份报告后的惊喜、对报告内容缺失的哀叹以及发现报告后的奇遇（《忠诚与背叛》133页）。关于报告的发现者厉华，第133页还有一个“编者”（未知编者为何许人）加脚注，特地加注说明是本书的作者之一。

但凡对重庆地下党那段历史和研究现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罗广斌这份报告的发掘者，是重庆著名的党史研究专家胡康民先生，关于发现报告的经过，《北京日报》2007年1月9日、16日刊登的长篇通讯《烈火中永生——〈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作者侯健美）中有详细介绍；关于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历史价值，胡康民先生生前也专门撰文进行过阐述（《〈狱中意见〉警钟长鸣》，载于《红岩春秋》2002年第2期）。目前被广泛引用的“狱中八条意见”并非罗广斌报告原文，而是胡老按照原文意思归纳总结出来的，《忠诚与背叛》也原文引用了胡老的这个总结。可以说，《狱中报告》在重庆党史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是熟悉烈士同时又亲历过渣滓洞和白公馆斗争的罗广斌在重庆解放伊始撰写出来的，它的历史的真实性远远高于罗广斌后来做的各种口头报告和参与撰写的各种文字作品。因之，从尘封的故纸堆里发掘出这份报告并向世人加以介绍的胡康民先生在相关学术史上也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现在，胡老故去仅仅3年，《忠诚与背叛》的作者就将这份历史功绩算到了自己的头上，如果这个错误算是小错，那么什么样的错误才不算是“小错”呢？

2、关于著名的《我的“自白书”》

《忠诚与背叛》称，陈然烈士在临刑前将一篇未完成的诗稿塞给罗广斌，在囚车开动的时候，陈然听到了难友们在集体朗诵他的诗作“……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这首诗后来经脱险同志加以整理，以《我的“自白书”》为题广为流传。

关于《我的“自白书”》的作者问题，重庆党史界和文学界曾经有过热烈的甚至是激烈的讨论，也有学者专门撰写文章对这首诗的形成过程进行过分析。不管各家看法有多大的差别，以下几个事实是很难被否定的。

首先，陈然曾经有过写诗的想法，但并未成稿。有史料称，“在他就刑的前几天，他告诉一位同志（本文作者注：该同志即罗广斌），他要写一首诗，题目是《没有了我》，他的诗的中心意思是说：我虽是死了，可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却得以永生！他这首诗一直到他就刑时还只是一个腹稿。”（《美帝蒋匪重庆集中营罪行实录》，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编辑，大众书店1950年印行）。

第二，罗广斌在白公馆被关押期间，他的父亲曾经前来探监并劝他自新，他拒绝了父亲的劝说，

回到监狱之后写了一首诗《我的自白书》明志，内容如下：

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
我没有什么要自白
就拿着皮鞭吧
举起你尖锐的刺刀吧！
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
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
毒刑、拷打、枪毙、活埋
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是一个人不能像狗一样爬出去
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
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
我的血肉全立此地。

……（胡康民《说不尽的罗广斌》，载于《红岩春秋》2000年第1期）

托名于陈然烈士的《我的“自白书”》与罗广斌本人的这首诗作在立意上是否相似，基本上是不需要再讨论的问题了。

第三个事实是，1959年在创作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的时候，罗广斌将自己当年写的那首诗修改移植给文中的烈士陈然，经过与刘德彬、杨益言共同讨论和杨本泉（杨益言的哥哥）的润色，形成了后来广泛流传的《我的“自白书”》，并被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3月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作为陈然烈士遗诗收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关于《我的“自白书”》的作者问题就有人撰文对讹误加以澄清。1984年第1期的《纵横》杂志发表了署名峻晨的文章《〈我的“自白书”〉的作者是谁》，文中说：1963年小说《红岩》再版前在京召开座谈会，作者向罗广斌问起陈然的诗是否有真迹保留、是如何从狱中流传出来等情况时，罗广斌回答了一段话，大意是：“这个问题使我很不安。《我的‘自白书’》并非陈然烈士遗诗，而是我们在撰写《在烈火中永生》一书时，以陈然临刑前要写一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概，以及陈然准备找一个机会在向特务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计划为依据，由几个人共同创作的。目的在于突出烈士的英雄形象。由于用了真名真姓，《诗抄》的编者误以为是烈士遗作收录了。”

1960年4月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囚歌——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殉难革命烈士诗抄》未收入《我的“自白书”》。《陈然烈士传略》的作者之一林彦曾经告诉笔者，当年编这部诗集时，《我的“自白书”》曾经入选，后来罗广斌的好朋友曹开说这首诗就是罗广斌本人的作品，不是烈士遗作，于是编者便撤下了这首诗歌。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这首诗真是陈然烈士遗作，当时就在重庆工作的罗广斌为什么没有反对撤下这篇作品呢？而《陈然烈士传略》里也未曾提及陈然在狱中有这样一首遗诗。

至于《忠诚与背叛》中所描写的陈然烈士在临牺牲前将未完成诗稿塞入战友手中，战友们集体朗诵他的诗作为他壮行，这样的桥段的确很煽情，问题是，这样的情节太经不起推敲：才“塞到手中”的诗稿，能够马上就“集体朗诵”吗？任何有过“集体朗诵”经验的人都会知道这决不可能。显然，这个情节仅仅是作者的想象。在《陈然烈士传略》里未曾见到这个情节；在罗广斌的《报告》里未曾

见到这个说法；曾经在白公馆狱中与陈然同牢房的脱险人士郑业瑞、毛晓初的回忆中都提到过陈然等人被提走杀害（《红岩魂——来自歌乐山的报告》厉华 重庆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但我们也未曾见到如此充满镜头感的历史画面。即便是在著名的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中，也没有如此文学化的描写。在虚构性上能够与《忠诚与背叛》的描写相媲美的，大概也只有小说《红岩》中《我的‘自白书’》的诞生经过了。可是，《忠诚与背叛》的作者不是一再声称“重写‘红岩’”的目的是为了让真实永存么？难道这“真实”只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难道只要有了“艺术的真实”，哪怕是杜撰的史实，也只能看成历史问题的“小错”？何况从艺术上看也并不真实。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忠诚与背叛》的第二作者厉华主编的《红岩档案解密》（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一书第 279 页有这样的内容：“……陈然几次昏死过去，醒来后怒斥匪徒，最后特务强行把他架起来，拿出纸笔，要他写出《挺进报》的发行名单，以扩大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面对敌人的酷刑威逼，面对敌人的穷凶极恶，陈然在敌人的审讯室里边以自己顽强的意志写下了不朽的诗篇《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最后敌人无计可施，只有将他押进牢房。”我们不禁要问，即便《我的“自白书”》真为陈然所作，那么《忠诚与背叛》的第二作者厉华先生为什么对该诗的写作时间说法不一致呢？难道临刑前作诗也是最新才解密的尘封档案么？

3、关于著名的“江姐城门口见人头”

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江竹筠打着雨伞，行走在奉节县城……她走近后，不自觉地跟着往上一看，却见城头上悬着一排木笼，那木笼里装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布告上，粗暴的红笔勾去了一连串的名字，几个熟悉的字迹很快跳入她的眼帘：匪首彭咏梧……”（《忠诚与背叛》281 页）如果不说出处，熟悉小说《红岩》的读者也许会认为上面这段文字是对《红岩》中江雪琴见到丈夫彭松涛被凶残的敌人枭首示众这段著名故事的缩写，而熟悉江竹筠烈士的读者又都知道，小说《红岩》中的这段故事纯属艺术加工。实际情况是，江竹筠烈士在彭咏梧烈士外婆家——云阳县董家坝听说了老彭牺牲的噩耗之后，当即决定离开云阳，她跟卢光特等人一起回到了重庆，向中共川东临委汇报了有关情况。当年的战友卢光特后来与人合作撰写了烈士传记《江竹筠》（重庆出版社 1982 年 7 月第 1 版，1996 年 4 月再版）。这部传记里从未提到江姐在撤离云阳后专程到奉节县去看老彭的人头，历史见证人卢光特在其他各种回忆中也都没有提到江竹筠在从云阳前往重庆的路上为看丈夫而特地去过奉节县城。湖北作家丁少颖的长篇纪实文学《红岩恋——江姐家传》中也未提到过江姐有这样的经历。此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历史细节——彭咏梧烈士被悬首示众的地方，并不是奉节县城，而是奉节县竹园坝。

显然，上面所引文字，只不过是把小说《红岩》的故事又和读者讲述了一遍而已，天气（阴雨）、道具（雨伞）、人物（围观群众和江姐）、地点（县城城头）以及其余细节（悬挂人头的木笼，写着大红字的布告）都与《红岩》小说所讲述的完全一致。而这位讲述者，正是声称要“重写‘红岩’”、“让真实永存”的《忠诚与背叛》的作者。我们不禁要问，在如此著名的历史环节上所犯的错误，难道也算是小错么？在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上如此照搬小说《红岩》，难道没有抄袭的嫌疑么？

另外还有一个可资佐证的是，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1964 年 9 月第二版中，中国青年出版社按作者之一刘德彬的要求删掉了江姐在城头看到丈夫的人头和陈然在刑讯室写《我的“自白书”》这两个情节。因为刘德彬知道这都是虚构的。

4、关于著名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型

“双枪老太婆”这个人物出自小说《红岩》，自小说诞生以来，许多读者就不自觉地把文学与历史等同起来，究其缘由，最主要的恐怕是因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有真实的历史原型，那么，著名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人物是哪一位呢？关于这个问题，小说《红岩》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历史见证人罗广斌和刘德彬的好友）张羽在《我与〈红岩〉》一文中回忆说：“我和罗广斌谈起陈联诗的回亿录，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他要我迟半天寄往北京，让他当晚先翻阅一下。……罗广斌后来在信中告诉我，陈联诗就是他在小说中创造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回想起来，这位面庞清癯，看上去质朴、文弱的老人，原来竟是当年华蓑山地区神出鬼没、威震敌胆的中华英杰。”。当然，这个看法也许是张羽的一家之言，翻阅华蓑山革命斗争史，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参与过川东武装斗争的女游击队员为数不少，陈联诗本人由于年纪偏大，并未正式参加 1948 年的川东武装起义，参与过这一起义的著名的女战士有刘隆华（中共党员，曾任广安禄市特支书记，华蓑山游击队第五支队政委）、张岚星（中共党员，曾任江津临时县委组织部长）、邓惠中（中共党员，曾任上川东第八工委妇女特支书记，歌乐山英烈）等。客观地说，“双枪老太婆”这一人物是《红岩》小说作者综合这些女战士的斗争经历塑造出来的一个艺术形象。

在与《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谈话中（2011 年 7 月 4 日《北京青年报》“揭秘‘红岩’真实的历史”，记者祖薇），《忠诚与背叛》的第一作者何建明把“邓惠中等于双枪老太婆”当作了自己的考证结果之一，在《忠诚与背叛》中更说邓惠中烈士会打双枪，是“游击队长”。而在公开发表的有关邓惠中烈士的材料中，我们从未见到过邓烈士会打双枪且担任游击队长职务的说法。由四川省委组织部编写的《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下）》（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和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四川革命烈士传第四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第 1 版）两本书中，都有文章详细介绍了邓烈士的革命事迹，据文中所述，邓烈士主要担任武装起义的后勤供应和联络工作，并未到过武装起义的前线，很难想象一个游击队长只留在后方做后勤工作而不亲临战斗的一线进行指挥。《忠诚与背叛》既然立志要还原真实的“红岩”，那就应该不辞劳苦把“双枪老太婆”这个艺术形象背后的众多女战士的事迹介绍给读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在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是一个有着很高知名度的艺术形象，实际上这个称呼也是小说《红岩》的原创，因此，把邓惠中当成这个艺术形象的唯一原型，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小错了。

5、关于著名的《黑牢诗篇》

歌乐山英烈中擅长诗文者甚多，在烈士留下的作品中，写于渣滓洞看守所并忠实记录革命者在牢狱中斗争生活的《黑牢诗篇》也许是最具知名度的。蔡梦慰烈士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将这篇诗稿抛在了路边的草丛中。重庆解放后被收验烈士遗体的人们发现，最早刊登于由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编写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1950 年初刊行），之后又被收入许多诗集及烈士文集。

《黑牢诗篇》写作于渣滓洞，《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江竹筠传》、烈士的难友兼诗友傅伯雍所著回忆录《狱中斗争纪实》中都提到，《黑牢诗篇 第三章 意志在闪光》是 1948 年 6 月江竹筠在渣滓洞受刑后难友们慰问江姐诗作中的一篇。除此之外，我们再未看到过任何有关《黑牢诗篇》的具体写作日期的历史文献。但是，《忠诚与背叛》却给出了《诗篇》几乎所有章节的具体写作日期：

第 42 页，狱中联欢会中间渣滓洞诗友聚集，蔡梦慰告诉大家他正在构思《黑牢诗篇》。据此描述推算，时间应为 1949 年春节。

第 61 页，李青林、江竹筠等难友被害后的第一天清晨，蔡梦慰继续写《黑牢诗篇》的第二章《战斗胜利了》。按文中所述事件，这一天是 1949 年 11 月 15 日。

第 74 页，杨汉秀被杀害的这一天，蔡梦慰完成了《黑牢诗篇》的第三章《意志在闪光》，按书中所述，这天是 1949 年 11 月 23 日。

第 79 页，1949 年 11 月 26 日晚，蔡梦慰向难友诵读白天完稿的第四章《欢迎呵，战友》。

第 113 页，11·27 大屠杀之夜，蔡梦慰正在写第五章《铁窗里的等待》，未完稿就被提出杀害。

如此详细的写作日期，不知道《忠诚与背叛》的作者是如何考证出来的。而最令人吃惊的是，在现存史料中唯一可以查证的《黑牢诗篇》（第三章）的写作日期——1948 年 6 月，远远早于《忠诚与背叛》所考证出的全诗构思日期——1949 年春节。

其实，无论《黑牢诗篇》写于那段黑暗日子里的何时，它都是称得上是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作品。小说《红岩》中一个著名人物刘思扬身上，就有着黑牢诗人蔡梦慰的影子。宣称要“还原历史”的《忠诚与背叛》貌似给读者“还原”了诗人的本来形象（其实，《黑牢诗篇》早就被收入了《革命烈士诗抄》（萧三 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 年 4 月第 1 版，后多次再版）、《囚歌》（杨顺仁 编注，重庆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后多次再版）等众多诗集，对歌乐山英烈有所了解的读者对这首诗以及它的作者都应该有所耳闻），但却对历史进行了过度的而且是错误的解读，如果关于《黑牢诗篇》的信息就此以讹传讹下去，那么，《忠诚与背叛》的“还原”之功抵得上误导之过么？

以上所列举的，只不过是《忠诚与背叛》对这段历史中的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的陈述中所出现的错误。若要深究该书在史实方面的谬误，大概又要费掉不少笔墨了。例如，关于小说《红岩》中疯老头的原型人物韩子栋，《忠诚与背叛》说他利用与特务一起上街买菜的机会逃离虎口，历尽艰辛到达延安。而韩子栋本人的自述是，他 1947 年 8 月 18 日逃出狱后，10 月 3 日在河南卫南县找到了组织，后组织上送他到晋冀鲁豫中央局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韩子栋话越狱往事》，载于《撩开神秘的面纱——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第 516 页，重庆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1 版）。中组部 1947 年 3 月就撤离延安了，当时的所在地是河北平山县。再如，《忠诚与背叛》称，在“11·27”大屠杀中幸运脱险的盛国玉，是因为丈夫被捕而牵连入狱的。实际上，盛国玉的丈夫余梓成从未被捕，特务在被捕的大竹游击队员游中象身上搜出的笔记本中记有几个人名，其中包括盛国玉，盛因此被捕（盛国玉口述，张传志整理《从渣滓洞死里逃生》，载于《垫江县文史资料 第 4 辑》第 73 页，1995 年 6 月印刷）。又如，关于蒋一苇、陈然、刘熔铸和吴子见等人办的地下进步小报（《挺进报》的前身）与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取得联系的经过，《忠诚与背叛》称吴子见是地下党安排“打入”这份进步小报的。这个“打入”是作者完全照抄刘熔铸回忆的结果（刘熔铸《〈挺进报〉回顾》，载于《挺进报》第 19 页，文履平等主编，群众出版社 1997 年第 1 版），吴子见本人生前公开发表过若干文章回忆《挺进报》的创刊、改名以及与地下党取得联系的经过，他从未说过自己是地下党派入《挺进报》的，据他的回忆，中共重庆市委是通过他的好朋友刘国鋳烈士与他先行接触，再通过他与刘熔铸等人取得联系，从而决定将《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的。《忠诚与背叛》中类似有违史实的例子实在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分析了。

三、在解密和还原的名义下

时下，在网络上随便浏览一下有关党史或者革命史的信息，就可以看到“解密”和“还原”这样的词语满天飞。当今的“解密”和“还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借“解密”“还原”之名，行编造虚构之实。例如，2010年，一部高调宣称还原了历史的名为《江姐》的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央视还特地为这部电视剧制作了错误频出的“解密江姐”的电视片紧随每天的电视剧之后播出。令人遗憾的是，电视剧《江姐》中的江竹筠与历史上的江竹筠烈士相距甚远，江姐的感情生活被演绎成了一场单恋加暗恋的多角恋爱，江姐的斗争生活被演绎成了一段充满悬疑和暗杀的复仇故事。这个电视剧播出后遭到了江姐入党介绍人和前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宣传委员两位革命老人的强烈抗议。

另一种“解密”和“还原”则是用时髦的语言形式来“攒”历史，《忠诚与背叛》当属此种类型。如上文所详述的那样，这本书的绝大多数内容，前人早就有所披露，甚至有些已经是公众相当熟悉的内容，例如“绣红旗”的不是渣滓洞女牢的江姐等人，而是白公馆男牢的罗广斌、陈然、刘国鋳等人。《忠诚与背叛》所做的，不过是把前人说过的东西加以编排和重新包装而已。但即便是对史料的编排，也有一些草率之处，很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前面提到的“吴子见打入《挺进报》”就是一例。又如，在谈到刘国鋳烈士的被捕经过时，作者引用了特务漆玉麟解放后的交待，其中提到刘国鋳的哥哥“特别说明了其弟有可能去荣昌县城的郭姓姑母处”，这段所谓的“解密”给读者的感觉是，刘国鋳烈士的最后被捕是因为亲人的出卖。而实际情况是，刘国鋳烈士在机警地逃脱了第一次的被捕后，马上转移到了荣昌大姐夫家（并非漆姓特务所回忆的姑母），这个去处只有烈士的六哥刘国铮知道，而刘国铮在烈士逃脱之后不多久就被特务扣为人质，每天被迫领着特务在重庆市中区、南岸等地的亲友处到处“寻找”刘国鋳（见曾紫霞《刘国鋳》第62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1版）。试想，如果刘国铮真的交出了弟弟的去处，特务又有什么必要再从叛徒冉益智口中获得刘国鋳的秘密转移地点呢？漆玉麟的交待材料中与史实不符的不止这一处，例如刘国铮的工作单位、刘国鋳和曾紫霞的关系也都有误。何副主席自称查阅过大量的史料和档案，既然对史料的占有如此全面，那么在写作的时候为何会将漆姓特务的回忆原文照搬到自己的专著中而不是进行去伪存真的分析甄别？

编造也好，编排也罢，这些所谓的解密和还原，无一不是在各路媒体进行高调宣传，而这些作品的严重失实问题却从未见到媒体曝光。以电视剧《江姐》为例，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之后遭遇当年重庆老地下党员的抗议，但是这抗议的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在老地下党员给重庆市委领导写了抗议信之后，以去商业化著称的重庆电视台仍然继续播放充满商业气息的《江》剧。至于《忠诚与背叛》，早在该书写作之前，媒体就有报道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先生要写一部纪实版的“红岩”，该书出版之后我们注意到，该书还拥有第二作者，那就是拥有多个头衔，兼任若干官职的厉华先生。《忠诚与背叛》出版后的宣传攻势在“红岩”书籍的出版史上不敢说是后无来者，但一定是史无前例的。而一位文学教授专门在报纸上写论文高度赞赏一部党史类著作，这在北大中文系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在本文的结尾，还要说说张颐武教授在与我们进行论争时提到的从他本人的专业角度，也就是“文学”角度来看《忠诚与背叛》的问题。与张教授比起来，我们是彻底的文学门外汉，但是，无论如何，一部把“娘希匹”一再作为蒋介石发言前缀的作品，一部将小说《红岩》中的著名桥段进行“拿来主义”式处理的作品，一部用“美女间谍”作为介绍女烈士章节标题的作品（见《忠诚与背叛》296页标题，“关于一个更加传奇的中共‘美女间谍’”），一部主要依靠编辑他人作品而写成的所谓“还原历史”的作品，能在文学上有什么创新和独到之处，大概并不是只有文学评论的专业人士才能下结

论的吧？

罪恶的档案

赵文滔

（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伤害》。作者原在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被打成“极右分子”。）

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泰戈尔

1978年，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时，弟弟突然从宁夏银川来了。往常他来之前，总会先写信来，或者打电话来，这一次的到，感到有点意外。他一走进家来我不由得好奇地问他：“你怎么突然来了？”

他笑笑说：“我也来落实政策来了。”

我一时不解地说：“你落实什么政策？”

“唉，听我慢慢道来吧。”

他洗完脸，坐下来，我给他沏好一杯茶，我们慢慢谈了起来。

弟弟1936年出生，一岁多就赶上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七七事变”。一家老小尽管经济困难，也不甘心作亡国奴。那时候，全家人带着他逃难，坐火车，乘马车，父亲背着他，全家从山西的太原爬山涉水跑到晋西南的山区，他可以说是在国难的战火中长大的。抗战八年，他从一岁成长到九岁。1945年日寇投降，他随父母姐姐到了山西太原，就读于太原新道街小学。1949年太原解放，他小学毕业，考入太原中学（后改为太原五中）。1955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天津大学五年制机械系。按照共产党的说法，他应该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历史清白”。

就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1957年，我被打成了“右派”。根据共产党的株连政策，他必然要被给予政治歧视和牵连。1960年他毕业。尽管毕业前北京已经有单位要他，但他已经成了“右派”的弟弟，自然要半明半暗地惩处他，把他分配到偏远艰苦的大西北——宁夏工学院去教书。

这个学校估计是大跃进的产物，对付了没有两年就“下马”了。把他又分配在拖拉机配件厂。

弟弟找了个妻子，是从上海大学毕业分配到宁夏的，担任中学教师。后来生了孩子，两人都上班，在宁夏当地没有抚养条件，只好把孩子放在上海岳母家。每年寒暑两假，都要从大西北回上海，不远万里去看孩子。六十年代两人的工资除了必须的生活费，积攒的余钱可以说全部作为车费送给了铁道部，一年年疲于奔命。

一直捱到落实政策的年份——1978年，那时候他的妻子在苏州工作，单位也讲起了对职工“两地分居”的“照顾”。他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十八年，属于“照顾”之列。单位和江苏

人事厅及几个单位联系，帮助他和在苏州工作的妻子团聚。

联系的公函发去，说明他是 1960 年天津大学五年制机械系毕业，对方几个单位立即来信表示要人。但把档案寄去之后，却又回信说“不好安排”。一连联系了几个单位都是如此。弟弟心中好生纳闷：“哥哥的‘右派’已经改正了，这株连还要连到几时？”

他们厂长和他关系不错，看到这连连的诧异结果，有一天，他终于找弟弟说明了底细：

“老赵，你看这联系的结果实在使人失望。咱们相处十几年了，我了解你，你是个好人，业务能力强，为人正派。但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些事厂里和你大概都想不到，今天我把情况全部告诉你吧。”

厂长接下来说了一席让我弟弟意想不到的话——

公函一去，都表示立即要人，档案一去，又变成“不好安排”，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因为你档案里有一份属于“未查清的问题”的材料。关于档案制度和规定可能你不太清楚。不管你是什么问题，只要已经查清楚就好办，就怕有没查清的问题，悬在那里，搞不清楚。

这是一份什么材料呢？是盖着“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支部”印章，发给天津大学的信，内容是：

……我司工作人员赵文滔系反革命分子，×月×日其妻田滨曾去你校看望赵弟赵文浩。当时我公安人员尾随田到你校，因为距离不便太近，他们谈了些什么未听清楚，希望你们对赵文浩严加注意……

厂长说，我们曾经仔细研究过这份材料，虽然他把情况说得如同反特小说，实际上它没有真实内容。可以说它是一封诬陷信。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我们正式通过组织关系调查了你哥的情况。首先他不是“反革命”，没有“反革命”的结论。他是右派，61 年就摘了帽子。72 年已经又被转为正式职工。现在又落实了改正政策。完全不是这封信所说的情况。

第二、你嫂子不是右派，也不是反革命，她去天津大学去看你，完全是她的自由，是正常亲属看望，不可能公安尾随。再说如果公安部门已经立案，进行尾随，也不会告诉二机部教育司支部。

第三、至于他们怎么知道你嫂子去天津大学去看你，这就知道了。

第四、这份文件的发出不符合规定。按照文件往来的规定，第二机械工业部对外发文，只能用“第二机械工业部”或者“第二机械工业部党委”的名义。“中共二机部教育司支部”只能在二机部系统内部作为发文单位。二机部 1959 年已经撤销，对于这封信的调查就很困难。

第五、按道理，天津大学收到这份材料，应该调查核实，核实清楚再入档。结果天津大学没有核实就装进了档案，我们调查清楚这是一份有问题的材料，但人事档案制度有规定，有问题的材料必须原提供单位撤出，其他单位不能撤出。现在国务院有文件规定：二机部已于 1959 年撤销，凡原二机部的遗留问题，由五机部负责办理。这就有头绪好找了。

厂长说，我看调动工作的事先停下来，先把这份材料的问题解决了，再办调动工作的事。

现在厂里给你开封介绍信，你先去找五机部，看他们是什么意见，然后我们再研究。

弟弟听得目瞪口呆，怎么自己竟成了好像特务活动的嫌疑人？只好按照他们厂长的意见，带着介绍信到北京找五机部来了。

这就是他也到北京来落实政策的原委。

第二天，弟弟去找了五机部，五机部干部司的人员说：“需要把档案要过来看看，看过之后，两个单位再商量。你先回住所等着。”回来以后，他就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他们厂长。

一星期左右，档案来了，五机部经过研究，认为这封信属于“不实之词”，由于二机部早于1959年撤销，人员已很难找到，无法查证，当即决定立即从弟弟的档案中撤掉这份“诬陷材料”。档案也立即退还工厂。

那天晚上，我就已经知道的情况想了想，根据我的分析，这份材料只有两个人可能是编造者。第一个是当时的支部书记梁心明，第二个是当时担任组织委员的杨贵星。我的根据是：

1. “中共第二机械部教育司支部”这枚章，只能由书记和组织委员保管，其他党员都不可能使用这枚章子。

2. 书记梁心明为人阴险狡诈，整人狠毒，既然把我打成右派，自然就要狠到底。出于他的人格，为了讨好上级，升级获利，他极有作出这种事的可能。

3. 杨贵星是个来自农村心胸狭窄的小人，高小文化程度，他将近40岁了还没有结婚（也许原来结过婚，是农村的，离了），他干的是一份“闲差”，名为人事干部，主管下属中专学校的人事工作，实际上下边学校的人事工作学校自己都管了，根本没他的事。所以他常常上班没事串办公室，和一些年轻女同事在一起叽叽咕咕，动手动脚，那些年轻女同事都想入党，要入党谁敢得罪“组织委员”？我上班比较严肃，往往我一进办公室，他们就散开了。有一次我对人说：“这算不算猥亵？”（我的这一说法确实不太合适，当时还没有比较合适的说法——“性骚扰”）后来他知道我的评论，自然怀恨在心，他也可能作出这一害人的事。

4. 诬陷者怎么会知道我妻子去天津看望我弟弟的呢？必然是他们偷偷拆看了我弟给我的来信。

这两个嫌疑人一位是书记，一位是组织委员。按理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可谁又会想到特殊材料也能制造出这种害人的“坏蛋”玩意儿来？

想想我们并没有作什么为害国家社会，有害共产党的事，为什么要这样收拾我们？尤其是由共产党员诬陷，其目的几乎是要置我们于死地。中国当真完全没有法律？这社会已经对我们不公平了二十年，这种伤害已经构成了“犯法”，而不是简单的“不实”的问题了。我主张研究一下，应不应该到法庭控告这两个坏蛋。

有一个星期天，我把在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的老同学找来，把情况讲给他听，能不能考虑“诉诸法律”，向他请教，听听他的意见。

经过他详细分析，我感到十分失望。他说——

“……首先，法庭不可能接受这项控告。历史上还没有告共产党员利用党的名义害人的案例。你想想，法院也是共产党领导，怎么可能立案受理？”

“其次，法院讲证据，你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不要说法院，就是一个单位的组织去问这两个人，他们肯定不会承认。你们能提供什么证据，使得他们无可辩驳，无法抵赖，证明就是他们干的？现在的情况是：从道理上说，他们有极大可能，但他们完全可以不承认，完全可以赖掉，你们怎么办？法庭又能怎么办？”

“再说，这两个人还很得势，就算你们不向法院控告，向他们所在单位的组织去告，他们那个组织也必然会替他们说话。他们要不承认，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们要探索‘公平’，实在说，社会上本没有什么公平。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怎么样？不也给他们扣上种种罪名？最后，折腾死人给你平反已经是很好的了。你们这问题，现在把‘不实之词’给你撤了也就完了。你们要打算通过法律追究责任人，那不可能。”

“至于责任由谁来负？没有人负责，你能把他们怎么样？……”

“是的，没有人负责，没有人负责。六十年代饿死 3000 多万人，有谁负过责任？全国有多少冤、假、错案？比你们冤的有多少？你们要告党的主要成员，弄不好要给你们再带来麻烦怎么办？再说了，你们又没有后台，我看还是认点倒霉就算完了，别再惹麻烦了。”

这就是一个法律教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律的看法……

谈了一个下午，我只好失望地把老同学送走。

五机部撤销了那份“不实之词”的诬陷材料，把档案退回工厂后，厂里立即把档案发到江苏人事厅。请他们按照“照顾两地分居”政策给弟弟安排工作。同时，厂里认为江苏必然会按政策办理，干脆发了一个月的工资，让弟弟先回苏州等候。

谁料江苏人事厅早先看过他的装有“不实之词”的原档案，等了半个月，没想到机械系毕业的机械工程师竟然分配到“蚕种厂”。我接到弟弟电话，主张不去，弟弟则要去，说看看江苏还能来什么花样。

到“蚕种厂”报到以后，那个厂长坐不住了。他对弟弟说：“老赵同志，你先等等，我马上找人事厅，还没有听说有这么干的人事厅，把机械工程师分配来‘蚕种厂’工作的……”

弟弟坐等了一个月，也看了一个月笑话，总算调令又来了，调林业机械厂。

这就是一个历史上毫无问题的，解放后才上中学、大学的知识分子，一个高级工程师，在共产党领导下，被党员诬陷无法申诉，郁郁无奈的一生。

这件事给任何人遇上也会气疯。我退休之后，每每和弟弟谈起这一生我给他带来的麻烦时，总是郁郁于心。1978 年，落实“改正”政策时，当时的书记梁心明来过一封信，无非是说过来说过去他没责任的话。说什么：“当初我不主张打你右派，他们要打你右派……”谁是他们？他们又是谁？看了信我没有理他。到了 1994 年，想起我和弟弟的遭遇，忍不住我给梁心明写了一封信。想和他讲讲道理，内容大致如下：

……我究竟和你是有杀父之仇，还是有夺妻之恨？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担任着支部

书记，怎么能干出这种诬陷好人的卑鄙勾当？你为什么要对我无辜的弟弟下此毒手？

我所以指出是你干出来的，是因为那个“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支部”的章，只有你和杨贵星可以保管，别人不可能保管。如果不是你，那就是杨贵星，没有第三个人……

过了些天，他还真回来一封信。信的内容是——

……所说教育司党支部给天津大学的信，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绝对不是推卸责任，我连你弟弟在天津大学读书的事也不记得。当年反右中期，我被派随同钱志道助理到西安了解当地部属学校、工厂反右情况，我回来时部里的反右已经基本结束。对你的处理我是奉命宣布的。王宝善、刘增智定为右派我并没有参加过讨论，司里反右成员是王万春、杨贵星、叶英，是他们确定的。

……对于天津大学收到的那封信，我的看法是：第一，没有给你定过“反革命分子”，这样说是不负责任的；第二，说我公安人员尾随监视是不可能的事，纯属幼稚可笑，瞎诈唬；第三，但不能认为这封信是百分之百的诬陷信。它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很坏的诬陷作用。特别是使你弟弟蒙受了不白之冤，吃了十几年苦头。他们和你个人有何恩怨，特别是你当时正上学的弟弟，为什么要下此毒手？这就是反右派斗争中发生的种种偏差，失误。

他的这封信，若是不知情的人，乍一看，会觉得似乎还有一点道理。但是熟悉情况的人就会知道，此人十分狡猾，他一生不知坑害了多少人而往上爬，靠的大概就是这种八面玲珑的本领。莎士比亚说过：“人假如作了无耻的事，总免不了还要用加倍的无耻来抵赖”。这句话就如同专门对他的写照。

对于他的这封信，我的看法是——

第一，他是党支部书记，搞运动都是他负责，他却一推六二五；他是主要负责人，他却说所右派都是别人定的，有的他还没有参加意见。

第二，他去西安没几天就回来了。因为西安只有一个西北工大属于二机部，再者，哪个单位的反右不是自己搞？哪个单位反右是依靠上级来人？他的这个说法，意在说他“人不在”，推得一干二净。

第三，把人都诬陷成和特务一样的反革命了，他却说：“不能认为是百分之百诬陷，而是客观上起到了很坏的诬陷作用”。这叫什么话？他一向玩弄掂过来有理，倒过去也有理的所谓“辩证法”，强词夺理，害了人还得说自己是正确的。

第四，“对你弟弟下毒手不是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好人，那都属于“反右派斗争中的偏差”。那么偏差是不是具体的人造成的？共产党、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改正”不就是搞错了吗？共产党、毛泽东没有叫你写诬陷信吧？这个责任你能推给谁？

……

一个国家，总是在谈“依法治国”，但害人者可以不受法律的惩处，不，是没有法律能惩处他，这算个什么国家？

这些受党信任的都是些什么人？不知道他们作过什么好事，他们却干了一些出奇的害人

的“恶”事，好像他们不是人类衍生出来的“人”，而是用“特殊材料”作出来的“非人类”的“人”。

故乡三题

陈仁德

（本文照片摄影：陈储德）

故乡的河滩

长江从遥远的雪山奔腾而下，在穿过无数高峡深谷后，来到了我的故乡忠县，浩浩汤汤的激流在这里忽然平缓了许多，江水终年拍打着江岸，天长日久，形成了一大片银沙铺就的河滩。

这是一片美丽的河滩。

公元八世纪，伟大诗人杜甫来到这里，泊舟岸边，写下了“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和“云气生虚壁，江声走白沙”的名句。在 1000 多年之后，我们仍然能从这些诗句中亲切地感受到，在杜甫的眼中这片河滩是多么的美丽。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河边永远都停泊着一个紧挨着一个的木船，乌蓬白帆，高桅长桨，比《清明上河图》里的船还好看。包着白帕子穿着长衫的船老大坐在船头大口大口地抽着叶子烟，时不时扬起头扯开喉咙朝岸上用悠长悠长的声音高喊：“走了哟——赶船的走起点——”

等到进城赶集的老乡们都背着背篋上了船后，船工们就抽回船板，用一根长长的竹篙使劲一撑，木船就从紧挨着的船中间缓缓挤出去了。这时，船老大多半还要习惯性地喊几声：“走了哟——赶船的走起点——”

坐在河滩上最有趣的事便是看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一般的木船五、六个人就能驾驭，有一种特大的被称为官船的大木船，则要三四十人才划得走。当这种船经过时，船上左右各十多个船工同时划动船桨，两排船桨从空中劈到水中，又从水中扬起，整齐划一，煞是好看。船工们异口同声发出的号子声震两岸，其气势夺人心魄。

不过，河滩上最精彩的场面却是拉纤。不论多大的船，从下游进城，都全凭船工们的肩膀拉着一寸一寸往上走。船工们双手双脚都爬在地上，一步一步地往前挣扎，沙滩上印满了深深的脚迹。即使是严冬，拉纤的船工们也全部光着身子，豆大的汗珠直往沙滩上淌。

船工们拉纤的场面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那种血肉之躯与自然的原始对抗，那种在拼命抗争中发出的悲壮铿锵惊心动魄的船工号子，那种黑红色的肩头被纤绳背带深深勒进去的细节，已经成为永远定格于我心中的画面。

到了夏天，河滩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每天午饭后上学前，小伙伴们便瞒着大人，相约溜到河边。我们有专用的手语，不用开口，只须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交替上下弹动，就是表示要下河“洗澡”（游泳）了。

到了河滩上，用最快的速度脱光衣服，把衣服随意地扔在沙滩上，就欢跳着扑进长江，去享受沉浸在凉凉的江水里的感觉。

那时每天河滩上都有数以百计游泳的人，大多是少年，也有少数中老年人，当然都是男性。大家都像约定俗成似的，一律全裸体，想都没想过要穿裤子。大家在一起赤裸相对，没有一点别扭，没有一点羞涩，真率极了。

在滔滔流淌着的江水里，我们尽情地游啊游，游够了，带着满身湿漉漉的水珠跑上岸四仰八叉地倒下去，在柔软的沙滩上来回滚动，全身便沾满了银沙，一会儿太阳晒干了水气，轻轻一拍，银沙又全抖掉了。

有时，我们会在浅滩中挖出很粘的潮泥，去岸上筑出一道几米长的滑道，就像公园里的梭梭板，然后光着屁股坐下去，嗖的一声，身子就从滑道上滑入了长江，激起一阵浪花。

有时，我们会把银沙和水调成“糊糊”，捧在手中让“糊糊”慢慢从指缝往下滴，滴成各种造型，有的像高塔，有的像山峰，然后用水冲掉又来。

有时，我们会在浅水中打水战，猛烈地往对方脸上泼水，直到对方睁不开眼，认输。不过这时我们也差不多睁不开眼了。

游泳时如果有帆船经过，小伙伴们便迅速游出去，偷偷接近帆船，敏捷地抓住船尾的木舵，这叫“巴舵”，抓住木舵后就毫不费力地跟着帆船往上游漂去，直到被船老大发现后在船上臭骂，才大笑着往回游。

偶尔有大轮船从江上驰过，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轮船腾起的浪峰一道道扑向岸边，我们便高喊着“斗浪，斗浪”跳进长江向迎面而来的浪峰游去，随着浪峰的起伏，一会儿跃上浪尖，一会儿又跌入波谷，嘴里快乐地叫着“呵呵呵”，其快活并不亚于如今的冲浪，直到轮船远去，波平浪静。

游泳本领提高一些后，便要去“巴驳子”了。所谓“巴驳子”，就是游到离岸较远的铁驳船上去。那些铁驳船长长的，高高的，孤伶伶地停在江中，靠一只小木船和外界往来。要游到铁驳船去，得从上游很远下水，才能横渡过去。游到铁驳船面前，抓住那只小木船的船舷顺势一翻就上去了，然后抓住从铁驳船上垂下的舷梯就像猴子似地爬上了铁驳船。

铁驳船是从重庆或武汉等大城市来的，对于在小城生长的小伙伴们来说，无异于一个外面的世界，那上面的东西都很新奇，穿着塑料拖鞋，开着一台小电扇，整日端着茶杯的船员在我们的眼中十分神气。他们见到我们这些赤裸着身子睁着好奇的眼睛的小孩后，总是大声吆喝。听到吆喝，我们就像做贼一般，哗的一声往船头跑去。在烈日暴晒下，驳船的铁甲板像烧热了的铁锅一样滚烫，我们稚嫩脚走在上面哪受得了，跑不了几步，就纷纷往长江扑通扑通地跳，跳水的姿势称为“跳冰棍”，即做立正姿势像一根冰棍似的直直地跳入水中。由于驳船较高，跳下去要沉水很深，才又慢慢冒出水面。

大约在1968年前后，长江上游常常漂放一些木排下来，木排很长，比一个篮球场小不了多少，有的木排就停靠到了忠县的河岸上，由忠县林木站派一个姓熊的老头（也许并不老）看管着。这位老头额头正中天生一个小肉包，大家背后都叫他熊包包。这木排也就成了我们的游乐场，每天都要在它周围游来游去，或爬上去小憩一番。

熊包包是不欢迎人们上木排的，他经常对我们板着很严肃的面孔。为了表示对他的愤慨，我们就在回家的路上爬上古老的城墙俯身对着江边，由一个人喊“预——备”，然后大家一起有节奏地大喊：“熊——包——包！”熊包包听到有人莫名其妙地喊他，在木排上回过头来无奈地说：“大叔们，我是哪点把你们惹了吗？”我们又继续高喊：“熊——包——包！”直到觉得解恨了才了事。

木排旁也系着一只小木船，一天，不知是谁说，趁熊包包不在，大家来划船乐一乐。这一提议马上得到了大家的赞成，于是七八个人便解开缆绳，有桨的操桨，无桨的拿舱板当桨，齐心合力将船划了出去。这时熊包包正好来了，大声喊把船划回来，大家看到熊包包那着急的样子，乐得开怀大笑，反而划得更起劲了。熊包包急得在岸上跟着船追，双脚直跺。

几个小孩子哪会划船呢，嘻嘻哈哈乱划了一阵，船就离岸越来越远了，大家还嘻嘻笑着，像没事一样。不一会，船被一股急流冲到了江心，大家才知道事情不妙了，顿时没有一个人敢再笑，都拼着命往回划。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一条暗流，船到了那里必然要被冲到对岸去，而且前面不远就是著名的钟溪滩，一年四季都恶浪汹涌，漩涡密布，连老船工经过这里都要特别小心。

正当大家操着家伙拼命划的时候，一个人突然说了声：“糟了，我没有力气了。”这一下大家全精神崩溃，散了劲，手脚都软得像棉花一样，看着木船迅速向钟溪滩方向漂去。

望着汹涌的江水，孩子们傻了眼，脸色铁青，不知所措，再也乐不起来了。

惊慌片刻后大家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镇静下来继续拼命划，也许是上天保佑吧，总算躲过了大漩涡，但只一会工夫，船已顺着水势下漂了好几里。好不容易靠岸后，大家都已垂头丧气筋疲力尽，还得光着屁股拖着船往回走。而这时熊包包已经急得快要吐血了。

水情险恶的长江有时会很可怕，每年夏天，都要从上游漂来几具浮尸，我们称之为“水胖子”。就在小小的县城里，每年也总会有小孩淹死，但似乎我们从来没感到过惧怕，就在刚刚打捞起尸体的地方，我们照样满不在乎地下水出游。



在长江的怀抱里，在银色的沙滩下，我们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快乐时光。到八十年代，河滩开始悄然变化，裸泳的人少了，穿泳裤的人多了，一些女性也开始勇敢地下河游泳了。与此同时，长江的水也开始污染，往来的帆船逐渐被机动船所替代，银色的河滩开始被一些露天仓库蚕食，成堆的垃圾出现在江畔。而这时，我也告别了青年时代，再也没了下河游泳的兴趣。

但我仍然爱着那片河滩，在我看来，它依然是美丽的。在八十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住在临江的一座高楼上，从窗口望出去，依然有山有水，四四方方的窗口，就是活脱脱的一幅风景画。我感受着杜甫“云气生虚壁，江声走白沙”的意境，索性将我的住所命名为“云气轩”，我自撰了一副对联挂在临江的窗口两边：“四壁诗书画，

一窗云水山”。夏天涨水的时候，长江的波涛拍打着我家阳台下的石墙，坐在阳台上可以直接垂钓，晚上在阳台上纳凉，涛声就在枕边回响，我又撰了一联：“隔窗邀月醉，移榻枕浪眠”，自以为乐在其中也。这还不够，我又写了一首诗：

吾住大江滨，终年与水邻。

卷帘沧浪阔，隔树画船行。

波摇两岸翠，月涌一轮冰。

最喜春潮涨，凭窗可钓鳞。

可以说，那片河滩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我太感谢它了，因为它给了我那么多的欢乐；我太爱它了，因为它是那么的美丽。

后来，我离开了河滩，离开了故乡；再后来，三峡工程开工了；再后来……一切都改变了。今年春上我回到故乡，特意去寻访当年的“云气轩”，出现在我面前的，竟是一片废墟，临江的整整一条街，都已悉数拆毁荡然无存。我艰难地踟蹰在那些残砖破瓦中，回忆着恍若隔世旧景，不禁怅然以悲。

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来了，6月30日，三峡工程二期蓄水将无情地淹没千里库区的所有河滩，一个延续了亿万年的时代，就要在那一刻走向终结。从此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无法再见到那片美丽的河滩，更无法领略河滩上的快乐了。在不经意间，我们成了美丽河滩的最后见证人。想到此，我决定在6月下旬赶回故乡去，去向那片美丽的河滩做最后的告别。我要久久地站在江边，睁大眼睛看着那片河滩一寸一寸地从我面前消失；我要在最后的一瞬捧起一捧银沙，让它长留在我身边，让我永远回忆起那片河滩和那些快乐的时光。

2003年4月21日子夜于重庆龙溪

故乡的黄葛树

故乡忠县（古忠州）是长江边上一座倚山而建的古城，在儿时的记忆中，忠州满城都是高大挺拔郁郁葱葱的黄葛树，大片大片的黄葛树就如绿色的云朵笼罩着宁静的古城，整座古城就像一片丛林。

古城南门外有一条临江的街，人称半边街。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条宽不过3米的街只有靠江一边有房子，而靠山的一边却是巍峨的古城墙。奇就奇在这道长长的城墙上几乎等距离地长着一排望不到尽头的黄葛树；更奇的是这一排黄葛树的根都是相连的，从第一棵到最后一棵，始终是一个根系，每一棵树的根同时又横生出去长成另一棵树。这实在是大自然的奇观。城墙上没有一点泥土，黄葛树的根全从城墙的石缝里深深地扎进去，看上去所有黄葛树都

如同紧紧地贴在城墙上一一般。那些交错缠绕粗大苍劲的树根从城墙上浮雕一般凸现出来，犹如群龙狂



舞，气势远胜北京故宫里的九龙壁。

半边街其实有一个很具文化色彩的名字——蔓子路，它得名于周末大名鼎鼎的巴蔓子将军。巴蔓子将军当年就是在这段城墙上慷慨自刎殉国的，后人为了纪念他，特地在这段城墙上修了一个小平台，



于是平整的半边街在这里便突然高出了一截。人们经过这里时，要先上三步阶梯走上平台，然后再下三步。说来也巧了，平台正中便是一棵亭亭如盖的高大的黄葛树，忠县人民世代相传的民谣“上三步，下三步，中间有棵黄葛树”，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我大姑就住在半边街上，这使得我从小就有机会经常去欣赏那一排气势非凡的黄葛树。坐在大姑门前，几步外就是城墙上的黄葛树。仰面看去，那些横斜交加的枝干将巨大的树冠托起，浓荫几乎将半边街的屋顶全部遮住，风吹过时，树影婆娑起舞，发出轻柔的沙沙声。而我们最盼望的却是“黄葛泡”成熟的季节。“黄葛泡”大约是黄葛树的果实，土红色，圆圆的，比樱桃还小，味略甜而涩，到了成熟时便洒满一地。那时

全国闹饥荒，“黄葛泡”竟成了我们的食品，选那些颗粒饱满的装进衣袋，像吃葡萄干一般慢慢受用，颇能解馋。

黄葛树的根须密密麻麻纵横交织如同鱼网一般，抓着那些根须很轻松地便可以攀上城墙顶端，这有点像现在时兴的攀岩运动，但却远比现在那种玩法潇洒得多。自从掌握了这条捷径后，我们到大姑家玩就不愿再经过半边街了，而是直接“缒城而出”，惊得大姑在城墙下大声叫。

但忠州城里最大也是我生平所见最大的黄葛树却是我家后门口那棵。我家背后是财神庙，庙旁有一小石拱桥，桥下是清的流水。那棵黄葛树就长在桥畔，恐怕有十层楼那么高，由于太苍老，树心已经空了，空空的树心竟可挤进去十来个小朋友捉迷藏。在离地丈多高的地方，主干开始向四面伸出分枝，就像一个微微张开的手掌，“掌心”凹下犹如一口大盆，我们叫它“一脚盆”，意思是可以容纳几个人围坐着洗脚。树干向上再次分枝的地方依次叫“二脚盆”“三脚盆”。小时候我们常常爬到“一脚盆”去坐着玩，我弟弟因那时学校闹革命停课闲着没事，常和小伙伴一起端着棋盘去“一脚盆”下棋，根本不用担心掉下树去，有时我们也到“二脚盆”去，但“三脚盆”却没去过，因为太高了。

这棵黄葛树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动物世界。树上栖息着多种鸟类，其中最多的是麻雀，至少有千只以上吧，每到黄昏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而树顶上那群鸦鹊却爱在深夜鸣叫，听起来有几分凄婉；树顶有一个比小桶还大的蜂窝，老是随风晃动着像要掉下来似的；树根底下是黄鼠狼和“花鼻梁”（花面狸）的洞穴，有一次，一只倒霉的“花鼻梁”深夜窜进我家大院，不小心掉进了我家的水井，结果让我们美餐了一顿，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

我们邻居有个叫刘三的小崽儿，那时都只七八岁，在爬树时和我们发生争执，竟一口咬定这棵黄

葛树是他奶奶年轻时栽下的。他奶奶听说后哈哈大笑，说：“我当娃儿时这棵黄葛树就是这样大了！”

这棵黄葛树在乡亲们的心中太古老太神奇，竟然衍生出一段神话故事，说的

是，黄葛树因吸收了多年日月精华而成精，化为一英俊男子，走出三峡，到宜昌做棉花生意去了。宜昌商界都知道有一个来自忠州的黄果术先生。黄果术年久思家，在离开宜昌时告诉当地一位朋友，今后到忠州财神庙旁的一座石桥畔来找他。那位朋友后来到忠州，问遍了财神庙旁的人，并没有一个叫黄果术的，却只见桥畔有一棵高大挺拔的黄葛树。那位朋友在黄葛树下徘徊良久才恍然大悟，原来黄果术就是黄葛树，他已成精了。故事荒诞不经，却颇耐人寻味，足见这棵黄葛树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如今，忠州城里那些令人神往的古老的黄葛树大多已荡然无存了。半边街砍掉黄葛树压着城墙修了一排房子，绿色的丛林变成了灰色的钢筋水泥丛林。我家旁那棵神奇的黄葛树被一个转业军官很费了些时间才终于毁掉，然后在那里盖了房子，被腰斩的黄葛树的分枝比磨盘还粗，当时周围的群众被激怒了，刘三（这时已成了大人）带头联名控告这位毁树者，据说后来那人被罚款 200 元了事。

偶尔回到故乡，走在陌生的街道上，便会回忆起那些令人无比怀念的黄葛树，我们的儿女再也无缘见识那些美丽的风景，他们只能在室内摆弄一枝一叶的盆景，而永远无法想象出大树的伟岸。

作为黄葛古树最后的见证人，我写出这篇文章，是想让后人知道，我们曾经拥有过许多美好的东西，但我们却没有保住它们。

2003 年 5 月

故乡的水井

汉语成语中不少与水井有关的词，都含有一种浓浓的故乡情结，比如井间，乡井，离乡背井等。在某种程度上，井差不多就是故乡的代名词。这种情结我以前感觉不是很明显。但一自进入中年且又远离故乡，竟真的时常回忆起故乡的水井来。

我的故乡忠州是长江边上一座古老的山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自来水还未在小城普及之前，生活在那里的人都是饮用井水。大大小小的水井星罗棋布般点缀在古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挑水人闪悠着楠竹扁担爬坡上坎，洒下一路湿漉漉的水滴。井水清澈纯净甘冽爽口，胜过如今的矿泉水。那时人们都习惯喝生水，从没听说过谁喝了生水要拉肚子。倘若口渴了，见素不相识的人挑水路过，只要喊一声“吃点水”，那挑水人就会立即停下来，让你伏到水桶上把头伸到桶里，咕噜咕噜地喝个够。然后你连道谢都不用，抹抹嘴就各走各的路了。

忠州城里的水井都有名字，“大水井”，“白鹤井”，“东门井”，“熊家水井”等等，且都是至少百年以上的古井。最深的井有一二十米深，俯身下望只见一个深深的黑窟窿。所有井清一色石砌四方形井壁。圆形井口，古朴凝重，有一种深沉的沧桑之感。那些圆形的井口都是用整块石头凿出来的，直径一般在一米以上，天长日久，磨得光滑泽润，像一件艺术品。

我家附近的那口井叫莲花池（不知怎么把井叫成了池），周围百多家人都是到那里挑水。据说莲花池是清代一个贫穷的寡妇用平生省吃俭用的积蓄打造的，人们曾在井旁立碑纪念她，后来碑不在了，但碑记仍载在县志里。这是一口约深 5 米的水井，水量很大，从不干涸，遇上雨天，井水溢出井口往四周横流，一大股白气从水面升起，将井口团团罩住，经久不散，如同传说中的仙气。

莲花池圆圆的井口高出地面一尺，童年时的我喜欢伏在井口往下望：清清的井水就像一面圆圆的镜子，倒映着天上悠悠的白云和睁着一双天真大眼睛的我，这时倘若谁将水桶轻放下去，水面一波动，悠悠白云和我的大眼睛便在水底摇晃起来，变成无数块闪烁不定奇妙无比的碎片。

大约在八九岁时，我便和姐姐哥哥一起去莲花池抬水了，之所以是抬水而不是挑水，是由于力气太小只能两人抬一桶。一桶水大约三四十斤吧，从井底往上拉时很吃力，只好把桶绳紧勒着井口。拉一手歇一手，看见那些叔叔轻松地一口气把沉甸甸的水桶提上来，心里好羡慕。

抬着水桶横穿过弓箭街（现名东坡路），再下一坡窄窄的石梯，走过一条僻静的小巷，绕过那棵高大的黄葛树，跨过一道清清的小溪，便到了我家后门口。这段路虽然不长，对于年幼的我却很吃力，最难走的是那坡石梯，下石梯时前低后高，扁担倾斜，水桶往前滑，水直往外溅。实在累了，在巷子里我们还得放下歇歇再走。就这样摇摇晃晃抬回家去，水只剩下大半。

那是我家最困难的一段岁月。母亲因严重肺结核远在 600 百里外的重庆歌乐山住院，几次险些死去，一连三年没出院；父亲常年下放在乡下工作，纪律苛严，不敢回家。而这又正是三年特大饥荒时期，整个国家都挣扎在饥饿线上。我们姐弟五人，刚上小学或幼儿园，其艰辛可知。

城里条件较好的家庭是不用自己挑水的，有专门挑水为业的人一分钱（后来是两分钱）一担送进门来。我家邻居有个叫关德明的人——印象中一个似乎永远赤着上身的汉子，从年轻时就挑水为生，连挑了几十年，肩膀磨得来仿佛比常人要宽厚一些，楠竹扁担放在肩上稳稳当当像生了根似的。他有个绝招，就是挑着满满一担水行走不需要用手去掌扁担，只用肩膀就能保持平衡；更绝的是他连换肩——把扁担在左右肩之间移换——都不用手，只把光光的肩膀快速移动一下，满满一担水就到了另一边肩上，而且水不会浪出来。我们这些小孩看着觉得简直神了！

关德明很和善，平时不言不语，有时在井坎上见我们从井底往上提水很吃力，还要帮我们拉一把。但是在 1961 年的某一天，他突然死去了，死的原因是他不知何事冒犯了居委会主任，主任下令公共食堂不给他饭吃，孤苦零仃挑了一辈子水的老人关德明在自己的小屋里挣扎着饿了三天后，睁着眼睛张大嘴巴咽了气，他那挑水的绝技也从此失传。

经常去莲花池挑水，渐渐就有了些经验，为了防止水溅出桶外，就在井边的南瓜地里摘两匹鲜嫩的南瓜叶扔在水面上；桶绳拉起打滑，就在绳子上打一些结。但仍然会遇到麻烦，最恼人的就是有时手一软，水桶便咕咚一声掉进井里。那么深的井，怎么把桶捞上来呢？我们束手无策，于是赶紧跑回家去告诉爷爷。爷爷年逾古稀，须发皆白，本来就为家中的事焦虑不堪，眉头从未舒展过，一听说水桶落井，便急得不得了，马上找来一根晾衣竿，拄着拐杖急匆匆地一路喘着气赶到莲花池。到了井边，把拐杖绑在晾衣竿上伸下井去，将水桶钩起来。

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我们也看会了。后来水桶落井，我们便不再惊慌，只需把爷爷的拐杖和晾衣竿一起拿来就行了。

在抬着水桶穿过小巷的漫漫岁月中，我渐渐长大了，到了读高小时（十二三岁），我终于也能挑起满满一担水走得飞快了。每到星期天，我要连挑七担水，把家里的水缸盛得满满的。

这时自来水已悄然进入了忠县城，我读书的那所小学里的一口大水池改建成了自来水管厂的蓄水

池，自来水管开始在大街小巷架设，人们惊异的眼光仔细打量着那不挑自来的“机器水”（当时人们都这么叫），在离莲花池不远的地方，一只锃亮的水龙头赫然出现，少数居民开始挑“机器水”而不再挑井水。那时在大多数人眼里，花两分钱挑一担“机器水”是很奢侈的，有一次“机器水”的龙头不慎失控，水哗哗流不停，居民们竟挑着水桶甚至端着锅碗瓢盆涌而来争抢“机器水”，因为那不花一分钱，可见“机器水”之神秘。

高楼密不透风地修建起来了，莲花池萎缩在一片阴影之中，高楼的厕所污染了莲花池的水源，井水水质迅速恶化，终于成为臭水，最后给填平了。

与此同时，城里的所有水井都遭遇了相同的命运，纵横交织的自来水网络延伸到了城里的每一个角落，饮用井水的历史走到了它的尽头，而我们这一代，则有幸成为这段历史的最后见证人。

当自来水在长江的取水点受到严重的污染，自来水中加进了大量的漂白粉之类的化学药剂，纯净水开始论桶出售之后，人们才回想起来，当初的井水是何等的甘甜，可惜它已经永远不会回来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又回忆起童年的往事：我伏在莲花池井口往下望，清清的井水就像一面圆圆的镜子，倒映着天上悠悠的白云和睁着一双天真大眼睛的我。而这一切都只能永藏心底了……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柴静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当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二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 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 17 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三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 X 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 h 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 h 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 16 年之久。

这一年他 23 岁。

四

他 27 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 4 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 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 25 分”。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五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 1926 年到 1937 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 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他在 1929 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 6 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六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愿，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七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这些学生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战争中，熊大缜被疑心是汉奸，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再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八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他在狱中一年半。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之

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九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十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他泪流满面。“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当年，举国欢庆，迎接你们进城，以为从此有了“明朗的天”了。谁知，这是水深火热的炼狱的开始，是疯狂屠杀的开始。叶企孙这位祖国的物理学之父，这位民族的精英，竟然落得穿着破棉鞋乞讨的下场。这无异于对文化、对人类、对文明最残酷、最下贱、最不知羞耻的杀戮！这是“明朗的天”吗？我们还有幻想吗？谁会想到人间会有这么坏的现实吗？感谢柴静，一位难得的大无畏的好记者！——一名八十五岁的老读者、老党员）

还原作家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土改真实故事

崔卫平

从前，也有一个叫周立波的人，比现在的周立波还要家喻户晓。他是一位作家，创作了小说《暴风骤雨》（1948年）。小说描写了东北一个叫做元茂屯的村子，1946年到1947年土改的全过程，成为指导全国土改运动的样板教材。

小说的原型为哈尔滨附近尚志县元宝屯。周立波曾担任这个村土改工作队的副书记，该村“恶霸地主”韩老六、贫雇农赵光腚，原名原姓写进了小说。1961年导演谢铁骊将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此时彩色胶片已经被广泛采用，但是为了展示当年沉郁苦难的背景，导演决定继续拍摄黑白片。一线大明星于洋扮演了电影中的男主角。于洋本人也是当年东北土改工作队队员，小说中的许多情景是他亲身经历的。

2004年，这个被称为“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元宝屯，着手筹备建立“土改博物馆”，村干部收集当年的农具、油灯、桌子，也迎来了新的客人——纪录片导演蒋樾和段锦川。这二位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带头人物，曾获过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高奖项。2005年，第三个版本的《暴风骤雨》，在“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面世。

与周立波当年从生活“提升”为艺术不同，纪录片人走的是一条“还原”的道路：寻找仍然在世的当事人，请这些已七八十岁的老人对着镜头讲述当年的亲身经历。

老人们在讲述中，异口同声谈到，一度众所周知的剥削阶级典型“韩老六”，其实一点也不阔气，甚至没有自己的土地，是帮别人打理，“与书上写的不一样”。他在日伪时期做过“保长”，是“群众选的”。土改运动不是除汉奸运动，因此在新的叙事中，需要他扮演“恶霸地主”的角色。群众并非那么容易发动起来的。工作队起初叫做“民运工作队”，对外没有称自己是“共产党”。而最初接近工作队的人，是村里一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这一点得到了已是高龄的于洋的证实。

当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后来多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包括退休的省委宣传部长等。能采访到他们，也是这部纪录片的一个特色——官方人士的面孔很少在独立纪录片中出现。这大概是因为这两位纪录片人，同时在给中央电视台做一部《土地的故事》的电视片，因此有一些可接触到的资源。

由于角度不同，这些外来的发动者与当地群众，在讲述语气上（肯定、否定或叹息）有所不同，但在一些重要事实方面，叙述还是一致的。比如，他们共同认为，土改最激烈的阶段并不是分田分地，

而是“挖浮财”时期，也就是进入到地主富农家里，直接拿走家中的粮食、衣服、牲畜、被子、家具等各种东西，当地群众称之为“扫堂子”，将整个大地用扫帚过一遍。农民们赶着大车，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吃粮也不给留下”。

打死人从这里开始。原工作队队员称，更早时，“打死人就没有批斗对象了，群众运动就发动不起来了”，但到了后来，一切仿佛失去了控制。于洋说，“按政策是不可打人的，但打了也就打了。”当然，如果坏人坏事不受惩罚，它们就会炙热地传播开去。那些带来新秩序的人们，没有带来新的严格的法规。

民兵们手上有枪，一般人手上有棍子和其他日常用具。短短十几个月间，人们仿佛还没有来得及体验分到土地的欣喜，便一下子转为疯狂的仇恨。纪录片人查了当地的档案：尚志县土改期间一共死了近 700 人，其中自杀 86 人，打死 273 人，枪杀 333 人。

不清楚这种仇恨中，到底有多少是来自自身。至少人们需要确证，分来的土地和物品，不能再交还给原来的主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接下来许多年轻人踊跃参军打仗，当时的口号为“保卫土地，保卫家乡”。由此产生的排山倒海的动力和热情，是武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不可比拟的。

除了当年电影《暴风骤雨》的片段，影片还穿插了来自当时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共产党的新闻片《民主东北》、《伟大土地改革》等片段，使得该片成为一次拥有众多不同声音的丰富对话，是一次难得的多声部叙述。

影片结束时，土改博物馆已建成。年轻女讲解员仍然重复过去教科书的老一套。

原标题为《多声部的历史叙述》，作者博客。